

目 录

绥远知名人士张遐民先生

……………卜效夏提供资料 刘映元撰文 (6)

革命熔炉

回忆绥远省军政干部学习团……………耿泽山 (25)

东桃地区骑兵指挥部的始末……………杜海荣 (36)

段履庄之死及其他……………郎正之 (42)

塞外满族拳师——吴德山……………张静文 (46)

塞上名“净”杨胜鹏……………邓孝明 (51)

我的艺术生涯……………韩世五 (57)

土默特蒙古族的婚姻仪式……………伊锡尼玛 (62)

乌素图召宗教活动仪式……………伊锡尼玛 (67)

归绥市的基督教……………薛宏道 (77)

清朝和民国初年的绥远地方部队

及驻军概述……………刘映元 (93)

绥远知名人士张遐民先生

卜效夏提供资料、刘映元撰文

一、家庭出身及幼年生活

张遐民原名张毓满，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生于呼和浩特市郊区黄合少乡二十家子村一个种地兼开店的“新发户”家中。他的祖先于清初即由山西寿阳普延村来到二十家子村耕种蒙地，成为二十家子村南营子的大户，不过到了他父亲张殿杰手里已经败落。张殿杰虽然只念过三个“春冬书”，却非常勤劳能干。和兄长分家以后，带上老婆娃娃先居住在老院外边的一间破土房里边，凭人缘好，以高利贷借上钱买马养车，自抱鞭子由丰镇购运木材，盖起一座砖瓦压边的七间大正房，开了车马店，从此逐渐又还原为地主。

归化城东地主，最讲究耕读传家。张殿杰因为没有念过五经，不能进科场考取秀才，认为是自己最大的遗憾，为了望子成龙，利用开店食宿方便的条件，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张遐民八岁时，请来山西定襄县红崖村的一个老童生李清泉在家中设立专馆，他的三子遐民和本家以及外姓的孩子们入馆受业。五台山附近的忻代“二州五县”在华北来说，系一个文风很高的地区，即使是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也不同于一般穷乡僻壤的“冬烘夫子”。李清泉在二十家子村教了三“春冬书”，誉满土默川以东的察哈尔右翼东山沟，好些大地主愿拿出高

“束修”争聘这个好教书先生前去设馆授徒。

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山西巡抚张之洞放垦牧场时，归化城的地主不少在东山沟购买了新地，张殿杰的叔叔也买了旗下营北面三道沟的土地，他的排行老七遂成了那里的大地主。听说二十家子村“老柜”请到一个好先生，要求把专馆设在“新地”上边，十一岁的张遐民遂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随着老师李清泉跑到凉城县属的三道沟，继续攻读四书五经。张遐民在二十家子是半耕半读，除了到田地里干活，还得回店内从事劳动。到了三道沟以后，日夜和李清泉厮守在一起，耳濡目染，给他童稚的脑海中，灌满了全套正心诚意和修身齐家的孔孟学说道理。

二十家子距离归化城八十华里，是去北京的一条“京大路”上第一个投宿的地方。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九月京绥铁路由大同修到丰镇以后，每天有好几百辆车到二十家子村过夜，因此张殿杰开的“轿车店”营业兴隆，很快就致富了。二十家子村四周环山，大黑河的水从中间穿过，灌溉西山那边公主府的“四村水地”庄园。河南的南营子居住着以张家为主的汉族农民，河北的北营子居住着一家蒙古大户，老弟兄叫宝月和崇月，小弟兄有大喜、寿喜和常喜，五个人地多人众，为全村首富。清朝时不准在“四村”以东的黑河上游开渠，恐影响公主府庄园的灌溉，故二十家子村西和当村虽然有两条长流水，但不能开渠引灌，旱地无法变成水地。民国成立以后，北营子的常喜住了土默特旗总管衙门，起了官名为常龄，字叫寿山，和南营子的张殿杰联合，跟“四村”大户打官司，要在黑河上游开渠，从归绥道尹公署打到北洋政府的大理院终于胜诉。可是开渠以后，因为浇水，常龄和张殿杰两家又继续争讼。张殿杰把

开店赚下的钱花净，借上债务运动官府，直到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绥远省政府成立，土旗参领兼总管衙门的科长常龄才向张殿杰妥协，由建设厅给决定了二十家子村浇水的水规。

张遐民受他父亲的影响，从小好胜要强，看到他父亲因为打官司经常被债主逼债，受衙役勒索，很感羞耻和凌辱。特别是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中秋节后，卢占魁匪伙窜到旗下营北山，他若不是冒充“小羊官”，几乎被请去当了“财神”。土匪没有绑架到大人，结果把他七叔的小儿子打死泄忿。因为北山上闹土匪，父亲把他叫回二十家子读书，农忙时下田，早晚在店中伺候客人。不料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秋天，土匪光顾到二十家子，把他的大哥张毓城绑去，在大青山后的草地上转了三个多月，才逃出虎口，跑回家中。张遐民对这些强盗恨之入骨，而官兵团队不肯认真剿除，更义愤填膺，于是在修身齐家之外，又产生了治国平天下的想望。加上“开店三年会相面”，处事待人很会观颜察色。在十六岁进城到归绥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受维新教育以前，便早成熟为一个非常懂事的青年。

张遐民在这时期，还有一段跟姨妹阎三玲的恋爱故事。他的姨母死后，最小的姨妹三玲由他母亲抚养。两个人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三玲长得相当美丽，并且特别聪慧，他教她念“千字文”和“名贤集”，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并会写字描画，比他书绘的还好。嫂嫂们常对着说“三小和三玲是一对天生的夫妻”，这话更加激发了他俩彼此爱慕之情。后来他的母亲和姨父都主张让他们俩个订婚，但他父亲因大相不合，坚决不允，致一对情人终未结成伉俪，对此张遐民引以为平生中的一大恨事。在他七十岁以后写《海天惊影》时，还念念不忘并述及那个让他扶着走路的裹小脚的农村姑娘。

二、由“店小二”变成洋学生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张遐民十五岁的那年冬天，归绥中学的学监（等于以后的训育主任）段韶钧（虞亭）放了寒假回北京探亲，坐着轿车投宿到二十家子张殿杰的店中，张遐民给端饭递水。段一看这个“店小二”特别聪明伶俐，便捉住他的手问他念过书没有，张遐民说是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段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张遐民对答如流。于是段韶钧和张殿杰说：“你的孩子很有出息，不能把他埋没在山沟里边，火车已经快通到平地泉，你的店开不多久了，何不把他送进学校深造，将来成材以后为你光耀门庭。住官办学校比入私塾省钱，我可以介绍他进高等小学”。张殿杰被段韶钧的话打动，遂决定让张遐民进归化城读书。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过了春节以后，他便和同村的一个私塾同学，坐上父亲赶的粟粮车，离开二十家子。经段韶钧给归绥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东区脑包村的李蔚洙（东山）写了一封信，并由他七叔的女婿在归绥中学读书的常斌魁领上，把行李搬进归绥县立高等小学（俗称“北高等”）。

张遐民初进“北高等”时，穿着兰土布棉袄棉裤和“实纳帮子”的“踢倒山”鞋，带着一顶紫绒毡帽，并且脑勺后边还拖着一条油黑的大辫子，城里的同学都瞧不起他，嘲笑他是“土包子”和“山药蛋”。特别是能打算盘演不了数学题，熟读四书五经不会作文，遇到讲演竞赛场合，自卑地不敢报名参加，所以在“北高等”念书时，张遐民还没露出头角。不过由于自己勤奋好学，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底高小毕业时，名列全班第七名，大红喜报贴到二十家子张殿杰已无车客住宿的店院门口。

清末民初时，高等小学毕业等于考中秀才，中学毕业等于

考中举人，所以都贴红色和黄色“喜报”。张遐民从北高等毕业的当年，考入归绥中学。当时归绥中学是绥远特别区唯一的中等学校。这座最高学府于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成立以后，所毕业的“洋学生”从北京和太原住完大专院校回来，尽搞地方派系组织。主要是归绥和“萨托”两大派系。而在归绥县范围，又分为潮忽闹村李正乐（子韶）为首的南区派、察素齐镇潘秀仁（箴四）与毕克齐镇赵允义（宜斋）为首的西区派，此外还有老藏天子村贾联魁等大地主组成的东区派。

张遐民的老家二十家子，与贾联魁的老家老藏窑子距离很近，并且贾家的“德宏堂”在“四村水地”的美岱村亦设有牛棚，经过贾联魁的拉拢，在他考入归绥中学不久，就被拴绊到归绥东区派系这个小圈子里边。

张遐民考进归绥中学，编入第十三班，也就是改为“三三制”后的初中第一班。当时的校长是萨拉齐县苏波罗盖村的祁志厚（定远），是年秋天过中秋节因没有放假，归绥县籍的学生掀起学潮，把祁志厚赶走，由托克托县的闫肃和全区学务局（教育厅前身）科长周炳章维持了一年多校务。一九二四年秋，赵允义和潘秀仁担任了归绥中学的校长和学监，直到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底“奉军”开到归绥以前。在此三年期间，潘、赵在校网罗派系骨干，张遐民以其政治上的识见与表现，为潘、赵所赏识，因而投入地方势力：“潘赵派。”

一九二五年，“国民军”的李鸣钟任绥远都统。那时大革命已经开始，国民军统帅冯玉祥将军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革命政策”，国共两党合作组成的绥远特别区党部也在归绥成立。加入国民党组织的，有共产党员，有追求进步的人士，也有抱着政治野心而混入的右派。一九二五年四月，张遐民经纪

亮、陈国英（均潘赵派重要人物）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三、初期的政坛活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各地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声援。绥远的“学联”也建立起来，张遐民被“潘赵派”的同学们选为“学联”委员，担任了宣传股长。他书写宣传标语，参与鼓动打砸“和记洋行”（英国投资开设的皮毛商行），在席力图召广场北台发表激昂讲演，到“民乐社”男扮女装演文明戏，这些活动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成了被各方面注意的活跃学生。

张遐民在社会上显露头角，正值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因此成为爱慕虚荣的女学生们追求的对象。可是他全力贯注于政治生涯，并以孔孟之道约束自己，除了留上分头外，从不吸烟、喝酒、下小馆，甚至对异性追逐也不加理睬，不料他的父亲张殿杰老汉，于一九二五年春天，瞒过他从二十家子附近的苏木沁村，给他订下一个姓孟的标致媳妇。他父亲背上订婚的喜馍馍来通知他，竟遭到他的坚决反对。学校放假，他回到二十家子，向为他说媒的表叔提出退婚，结果被臭骂一顿。回到家里他大哥说：“你给张家丢尽了人，有本事就不要回这个家”，张遐民听了，二话没说，离开二十家子，回到学校。一九二六年农历九月，张殿杰又进城来，逼他跟孟女结婚。说：“你如果不回去娶妻，就不是我的儿子”，他怕担“忤逆不孝”的罪名，向旧礼教投降，回到二十家子和衣在洞房睡了一星期觉。一九二八年，经由贾联魁和张守俭说合，出“遮羞钱”，将孟女送回苏木沁村。

国民军在绥远只统治了一年多，在张作霖的“奉军”、阎锡

山的“晋军”和吴佩孚的“讨赤军”联合进攻下，于一九二六年向甘肃撤退。绥远的都统，由阎锡山派商震充任。主政者虽然更迭，但因阎锡山仍与南方的国民政府暗中相交往，并不限制绥远的党务活动，是以国共两党还能表面合作在一起，继续活动。中央派到绥远指导党务活动的五人中，有四人共产党员（杨晓暉、路作霖、王建功、麟祥）。在国民党组织的促动下，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曾举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斗争。即即在归绥城南孤魂滩刑场，召开了有京绥铁路工人、郊区农民和城内商学两界五千多人参加的“难民请愿大会”，反对政府清丈地亩、增加赋税。会后，队伍游行进城，捣毁地亩局和县公署，包围了都统署，都统商震在声讨声中，向革命群众妥协，充许停止地亩清丈，撤换大会指名提出的几个贪官污吏，斗争取得了胜利。在孤魂滩召开的大会上，张遐民穿白茬皮袄，截了毡帽，化装成郊区农民，登台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演讲才能。

一九二七对四月，在“民乐社”召开国共两党合作的全市第二次国民党党员大会，选举归化市党部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会，张遐民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执行委员（赵允义当选为候补委员，潘秀仁当选为监察委员）。这时张遐民在纪亮的直接领导下，走上暗中积极反共的道路。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蒋介石的屠刀断送了。绥远的国民党右派和商震勾结一起对付共产党。四月间，他们夺取了归化市党部领导权，改组“绥远区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会”，还成立“清党委员会”，张遐民、潘秀仁参与了清党委员会的领导，该会领导成员，都得到蒋介石南京中央党部的任命。他们于四月十五日以前的某天，派包括张遐民在内的五人代表，到新城都统署去

见商震，要求扣捕共产党员。张遐民首先声称“如不制裁共产分子即请制裁我们，决不能合作。”商震当晚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旧城各中等学校，进行搜捕。因绥远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有的随国民军西退，有的转入地下，仅在“职业学校”扣捕了教师杨晓晖，在归绥中学逮住了参加“共青团”的张园林（茂才）和丁钰文等两个学生。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冯、李宗仁的北伐军进到河南，闫锡山亦公开通电共讨奉军，十一月，奉军进逼归绥，绥远省国民党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逃到太原，留下张遐民和王泉、李森，在绥负责党务。

奉军进入归绥，奉系的郭希鹏任绥远都统后，搜捕国共两党的党员。张遐民急忙出走。因怕坐火车被侦探发现，化装成农民，逃出归绥，起早到包头，投奔李正乐。这时李正乐在满泰部下担任军需处长，经过商酌，决定由张遐民偕李正材到南京汇报“潘赵派”在奉军占领区的工作情况，并要求蒋介石给绥远的地方武装满泰、刘会文、王英、陈玉甲以名义，伺机往出驱逐“奉军”。

李正材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部队的连长，奉命回察绥组织骑兵的。张遐民和他相偕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化装成小买卖人，闯过奉军在火车和轮船上的严密检查，由塘沽航海到南京。蒋介石那里顾得上接见他们，由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祁子厚领上他们见了蒋的秘书长陈立夫和国民党元老陕西三原的于右任。于右任给他们带了一封致刘会文的亲笔信，让刘会文在归绥联络满泰、王英和陈玉甲倒戈把奉军从绥远驱逐出去，以配合北伐。张遐民和李正材在南京过完春节，即由原路北返，把信件和几张委任状装入暖水瓶中，再闯过奉军的检查，匆匆返回

包头。李正乐听了张遐民关于南京一行情况的汇报之后，又派他潜返归绥，去做刘会文和陈玉甲两部的争取、说服工作。

张遐民潜返归绥去找刘会文，经过刘的军法处长马定国（可一）的接待，在旧城小南街见了躺在大烟榻上的刘会文。刘会文也是早期归绥中学的毕业学生，把张遐民带回的信和委任状收下，对张遐民这个小时的同学敢于冒险叛离勉励了一番，然后说“此间风声很紧，老弟最好离开归绥，关于大事，容我从长考虑，再做决定”。张遐民觉得话不投机，只好离开，返回包头。因在包头怕别人注意，又跑到萨拉齐鄂尔圪逊村，去找原归绥中学同学现在村中教书的李雨田潜藏起来。

一九二八年五月底，蒋、闫、冯和李宗仁四个集团军，分道进入直隶北部，对盘踞奉军的北京完成会攻态势。李正乐预测局势变化及时打发张遐民回到归绥，隐藏于赵子南的“明善书局”库房里，领导了几名“潘赵派”青年骨干，准备奉军一撤退就往出插青天白日旗，并挂出国民党部的牌子。在六月二日，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于皂姑屯车站之前，绥远的奉军已接到“大元帅府”的电报，连夜撤走。张遐民得知奉军撤走的消息，赶忙糊制党、国旗，书写标语口号，并拟就归绥市党部告全省同胞宣言书，于第二天清晨在全市贴出和张挂起来。不久，晋军从大同开来，商震又担任了绥远都统。逃往太原等地的党务人员又返回归绥，组成绥远省临时党务委员会，也就是变相的国民党绥远区党部。委员会九名委员中，有张遐民、潘秀仁、赵允义。委员会创办《革命日报》，鼓吹“潘赵派”在敌人统治下坚持战斗和最先光复绥远的赫赫功劳。而这场政治戏剧，张遐民扮演了“唱红”的角色，更被他的后台老板们，视为他们的主要台柱子。

四、被傅作义将军所器重

一九二八年秋天，曾任归绥中学校长被学生赶走的祁志厚，经国民党中央任命为绥远党务指导委员，偕焦守显等重返归绥。祁、焦在绥组织起祁焦派，跟潘赵派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把潘赵派中的部分骨干，托辞开除出党，其中有张遐民，又将潘、赵调离归绥一中。张遐民自一九二三年考入归绥中学，没有安心读两年书，就参加了社会活动，他感到国民党的党派斗争，是拿上青年人做牺牲品，所以想摆脱政治回学校把高中读完。不料“祁焦派”以稽查共产党为名，强迫张遐民等“潘赵派”青年限期离开绥远。经李正乐给他们每人三十元现洋路费，于十一月到达北平，把行李搬进北沟沿绥远会馆，这时，张遐民由职业学生变成了流亡学生。

张遐民到达北平，经李桃园介绍，到第三集团军总部政治部当了少校干事。由于他无心于政治生活，一心一意准备考大学，因此每天只在上午到东城政治部上班，下午便去中国大学予科听课，夜晚还补习英语和数学。

一九二九年张遐民报考北京大学名落孙山，而被私立中国大学录取，入了经济系。为安心读书，辞掉政治部的工作。在北京住大学用钱较多，张殿杰老汉在他休退老婆时，即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接济，因此，进入中国大学后的一应花费，仍是贾联魁予以帮助。

这时，王靖国担任绥远警备司令，阎锡山已内定他担任绥远省主席。王靖国为了予作准备，捐资培养旅平的绥远籍大学生。张遐民经梁恒甫推荐，结识了王靖国，王允许每年供给他二百元学费，才把住大学的经济困难解决。

这一年，曾与张遐民同时在绥远参加“学联”，“奉军”统治时代又一同从事秘密驱奉工作的卜效夏女士，由绥远女子师范毕业，考入北平国立师范大学。他们在绥远时本来就彼此爱慕，经卜的师大同学云秀桐女士提婚，张遐民并向潘秀仁写信商量是否可以，潘给他们送了一个镌有“同心协力，奋发有为”八个字的白铜墨盒，算是遵师命而登报与卜效夏女士开始同居。张遐民秉性耿直，绝不象一般人拿着大学生招牌向各方面乱领津贴。他们在公寓建立起小家庭后，过着兰布长袍的朴素生活。第二年他们生下一个男孩，因为无力雇用奶妈，便将孩子送入北平婴儿教保院抚养。院内设备不好，孩子只活了八个月就夭折死去，所以生下第二个男孩，只好送回二十家子交给母亲照看。张殿杰老汉虽跟儿子绝裂，但对孙子还是留了下来。现在张遐民有两男一女，孙女、外孙竟有四个念大学的。

一九三〇年五月，阎、冯联合反蒋，中原战争爆发。九月张学良率“奉军”入关，晋军及国民军全线崩溃，奉军控制绥远。经张学良的推荐，傅作义将军于八月担任了绥远省政府主席。潘秀仁以省党委委员担任了教育厅长，张遐民恢复了党籍，被任命为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代表，出席华北十二省党部每月在北平召开的联席会议。一九三二年六月民生渠在萨拉齐磴口举行放水典礼，张遐民随中外记者，以归绥旅平学生代表的身份，回来参加。在会上，张遐民发表了歌颂晋绥当局剿除土匪致力地方建设的讲话。当时，傅作义将军和王靖国均在场，对张遐民的讲话非常赏识，经王向傅介绍张遐民在傅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过后，傅对潘秀仁说：“张遐民是咱们绥远的人才，我要培养这个好后生”。傅给张遐民汇去三百元钱，供他住大学之用，张退回一百元，并给傅回信说：“我有

二百元就够了，主席可以拿这一百元另培养其他同学”，并给王靖国去信，表示已接受傅的津贴，建议王靖国将给他的津贴资助考入北京大学法商学院的张国林。张遐民因退婚及念大学已经花了贾联魁好几百元钱，自从领取王靖国津贴后，即不让贾再往北京汇款。不管是张遐民真心实意，还是故做姿态，他这样处理的结果，赢得绥远官绅们的器重。“潘赵派”操纵了国民党部，为便以请客吃饭进行政治拉拢，出资集股让贾联魁为经理，雇用清末民初归化城“小班馆子”的名厨师，成立了“麦香村”饭庄。贾从小把张看大，知道他俭约成习，怕他用脑过度，弄坏身体，经常把“麦香村”所烙的归化城各种名贵糖饼，装入柳条篓中，托人捎到北京给张遐民食用，以增加营养。这位“德宏堂”的贾三先生，对于他在家中疲于奔命执领三处牛犊、城东有名的“屈勒受罪老财”哥哥贾二旦也不如对张遐民这样孝悌关怀。

张遐民所住的私立中国大学，是北平第二流的高等院校，但是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却有李达、陈豹隐和侯外芦、黄松龄以及陶希圣这些中国学术界左右两派的名教授在里边讲课。这时张遐民已被绥远的潘、赵和李正乐等俘虏，思想早已定型，对李达等所讲的政治经济学与唯物辩证法，递不进耳朵里边，对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却没费多大劲就融会贯通了。张遐民不是花上钱买文凭，以挂大学毕业生的招牌，而在四年中，除了上课就蹲图书馆，读了古今中外不少书。他也曾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但由于观点转不过来，收获不大，遂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信仰了斯密亚丹和李加图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说。

一九三三年五月，张遐民从私立中国大学毕业，回到归

绥，担任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秘书兼蒙族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同时，还担任绥远省政府的农村经济研究专员。他的妻子卜效夏女士，第二年毕业返绥，担任了绥远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任及蒙族师范的教员。

这时地方派系斗争相当激烈，潘赵派的政敌陈国英，在国民党省党部分管宣传，兼任国民党喉舌《民国日报》社长。这个舆论机关，不听潘秀仁指挥，逼使潘秀仁另立《朝报》社和《绥远通讯社》。张遐民大学毕业后回来，就担任了《朝报》社的主笔，每天上下午到省党部和省政府上班，夜晚还得到《朝报》社，另外还要到正风中学（潘秀仁办）和女子师范讲授公民（即三民主义）。张遐民如此苦干，可是潘赵派中不少人已腐化堕落。张遐民感到：知识分子，庸庸碌碌，日久天长，易与一般世俗同流合污，如此下去，终必意志颓丧一事无成。他认为必须趁着年力精壮，继续深造，学成归来，好为地方作出一番事业。他把这些感受向傅作义将军谈出，得到傅的勉励和支持，慨然应允每年从私人收入中向他资助一千元，让他到日本留学。

五、留学日本

一九三四年冬天，张遐民代表绥远国民党省党部，到山西五台河边村，参加阎锡山父亲阎书堂的盛大丧礼，事毕，便由太原坐火车至天津，从塘沽乘轮船抵达扶桑三岛。

张遐民到达东京以后，先与后套的常佩三住在一起，在常的帮助下，四个月内即学会日文。一九三五年四月他考入早稻田大学的农业经济组。因为傅作义将军正在绥远推行乡村建设工作，经指导教授久保田明光博士同意，专研究农村土地与农

业合作两个问题，除了每周到久保教授家中出席一次座谈会，每天在学校图书馆的研究室阅读，黑夜仍回公寓中钻研，经房东太太催促熄灯才就寝。

潘秀仁怕张遐民被傅作义拉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把他选为出席“五大”的代表。他因为不愿意耽误学习又舍不得这一出头露面的机会，故推迟行期，于开会前一日才到达南京，不料已把候补代表纪守光报了上去，张遐民当然不便争执，只好再返东京。

一九三六年底，潘秀仁的政敌焦守显，受太原绥靖公署和绥远省政府之命，以欧美农业考查专使名义，赴美考查，道经日本。张遐民不计宿怨，协助其与另两位近同乡，组成一个考查团，在关西地区考察了一个多月。考查完毕，张遐民和常佩三一起，以焦考察笔记，为焦写了一本《日本农业合作考察记》，在东京印成小册子，寄回晋绥替焦交差，并供有关部门参考。

这年底，张遐民经久保田教授指导协助，一个人又到关东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回到东京写成《日本农村产业合作》一书，寄到上海正中书局出版，不意原稿于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乱中遗失。“西安事变”之后，张遐民还和留日各大学十几个省的国民党籍学生十八个人，取“以夫子为木铎”之意，成立了一个“木铎社”，旨在以三民主义对抗马列主义。

张遐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两年，于一九三七年四月毕业。毕业论文是《中国土地问题》，以三民主义中规定而没有实行的“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甚至拿出阎锡山空喊的“土地村公有”口号，驳斥共产党在苏区深得民心并促进生产的土地政策，当然博得德国柏林大学毕业的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久保田教授的认可和称赞。他回国离开东京时，久保田还亲自送往车站，赠给他一个漆盒，并叮咛他如果归国失意，可回早稻田大学担任讲师。他由长崎上船抵达上海，遵照傅作义将军来信指示，先去江苏省萧山县看了那里的农业合作，然后到山东邹平参观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他和梁的思想非常接近，回到绥远为傅写了好几万言的邹平参观心得，这时傅正以邹平、定县与广州李宗仁及河南柏庭芳等所搞的村治经验加以揉合，在绥远建立“乡建会”，推行“乡建工作”，张便在绥远“乡建会”担任了农业合作专员。傅让他拟出计划，先在归绥县试点。计划已经拟好，还未来得及研究，“七·七”芦沟桥事变就已爆发。

六、在抗日战争八年时期

全面抗战展开不久，傅作义将军率三十五军离开绥远，到了山西。绥远省政府人员向陕北榆林转移。地方各派士绅的首领，齐集包头开会，决定成立“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公推张钦为总指挥、潘秀仁为副总指挥，于存灏为前敌总指挥、张遐民为总参议。十月十四日归绥沦陷之前，张遐民随“自卫军”总部撤到神木县城。十一月傅作义将军率三十五军由太原突围而出，到达离石县的柳林镇，张遐民由神木投奔傅作义将军，被委为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少将军事特派员，负责“自卫军”与伊盟境内之马占山将军的“东北挺进军”等部的联络。

一九三八年初，傅作义将军到达河曲，“自卫军”总部离开神木，去河曲依附三十五军。张遐民调到傅的总部工作。四月间，三十五军反攻归绥战役，俘获了十几个日本官兵，张

遐民和凉城留日归来的赵励师，专作说服教育俘虏工作。队伍从归绥近郊撤回河曲、保德和偏关，傅为恢复绥远的行政，在敌后建立抗日政权，把绥远化为三个专区，任张遐民为绥中大青山的第一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赵励师为绥东蛮汗山的第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前丰镇县县长陈应道为绥西后套的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遐民于这年九月，由“自卫军”的第四路军护送，从河曲到达大青山，把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设于“第三路军”指挥部所在地的宿尼板申村，“自卫军”都是由地方团队和土匪乌合组成，带兵官像掌握喽罗的武勇“寨主”，非常讨厌知识分子，对专署及归、萨、武、固各县的游击县长所带的文职人员一律称“袍子先生”。张遐民上了大青山以后，连“第三路”也认为他们是包袱，并感到碍手碍脚，故号令施发不出宿尼板申村外。在大青山呆了不到一百天，正在苦恼的时候，突然接到傅作义将军的电报，叫他赶快到河曲有要事相商，始脱离大青山，摆脱那一进退维谷的环境。

一九三九年初，傅作义将军到陕西武功出席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决定脱离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率“三十五军”回后套就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至此晋绥分家。傅把张遐民电召到河曲，就是让他先到决定好的临时省会临河县陕坝镇，去恢复一九三五年六月“何梅协定”以后仵顿的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已推荐张为委员兼书记长。接着“三十五军”和绥远流亡省政府，同时由河曲和榆林迁到后套。

武功会议前，于一九三八年，傅作义将军即从延安与西安接纳和招收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与进步青年充实了“三十五军”和“绥远游击军”的两个政治工作系统组织。迁移后套后，傅又仿照晋西北续范亭“华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办法，成

绥远的省、县、区、乡四级“动委会”，把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都吸收到里面担任县、区书记和乡村干事。在这支进步力量的推动下，绥西出现了如火如荼的抗战气氛。一九四〇年初连续夺得包头、绥西、五原三大抗日战役的胜利，即是在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战斗的情况下取得的。

武功会议后，在绥远开始出现反共逆流。张遐民在陕坝组织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五个执行委员中，除了五原的辛崇业，其余的托县耿正模、武川邱明星、凉城刘汉与集宁陈国祯都属于“潘派”。并委任包头李树茂、赵仁甫和归绥柴生华，组织了五、临、安三县的县党部。他就是以这些人为骨干，着手反共活动。

傅作义将军为了统一军政人员的认识，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开始，在五原新公中和临河百川堡举行了几次抗战建国讨论会。主持人有从延安派来的潘纪文，也有掌握绥远省国民党务的张遐民。在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时，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条不同的抗日路线展开大辩论。国民党省党部的委员兼组织部长田馨年，加上未来的“三青团”干事长赵仲容等，都被左派批判得理屈词穷，张遐民挺身而出孤军作战，和潘纪文等展开思想交锋，虽然败局无法挽回，仍然表现了他一定的辩论才能。

一九三九年八月，蒋介石派“CC”头子姚大海，从重庆来到五原，向傅作义将军施加压力。此后，绥西政局发生新的变化，延安派来的共产党员护送回延安，大批进步青年纷纷离开。绥西的统一战线局面出现逆流。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大会在重庆召开，张遐民以绥远的参议员，提前赴渝出席参加。他路经兰州的时候，日军已经进入后套。到达重庆后，首先去见国民

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满以为自己在后套和共产党斗争有功，并且从国民党军队打的最出色的绥西前线而来陪都，一定会受到热情接待和垂询备至，不料朱盯着他穿的一身旧布棉军装，只和他谈了五分钟话便说“写一书面报告”，来了个端茶送客，使他非常气愤而失望。不过开完国民参政会入“中训团”受训时，正好五原大捷的消息传来，张遐民在“中训团”一跃而成为红人。除了让他在升旗讲话时报告了绥西的情况，并在结业以前受到蒋介石的第二次接见。这样张遐民才由灰心失意，扭转为进一步效忠于他的“蒋总裁”了。因为张遐民书生气质较重，并且以孔孟之道处事接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认为他反共“不力”，另派张庆恩接替他的绥远省党部书记长职务。他由重庆回到陕坝，傅作义将军和他说“上边已决定另派书记长，你去组织绥远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好好解决一下土地问题，在后套做些贯彻民生主义的实际工作”。

后套的土地兼并非常严重而突出，共有三种不合理现象。一是汉族地主以“永租”的形式，把蒙旗的牧场据为私产，再是蒙旗报垦开放土地时，牧场大部分被垦务官员占有，三是蒙旗把余荒包给“地商”，“地商”进行逐层转租。这三种类型的土地，没有经过详细丈量，实际亩数与契约所载悬殊很大。加以豪强权贵玩弄权术，差徭负担绝大部分压在没有田的耕者肩上，官厅亦难能如实征收田赋和税款。此一问题从清朝乾隆末期开始，已经存在一百三四十年，绥远的将军贻谷和都统蔡成勋及商震等都没有彻底解决。一九四〇年春天五原战役后，傅作义将军没收了五原县几个投敌大地主的土地，又责成地政局进行土地测量，把超出契约地照所载的地亩，连同临河县第四区三道桥“杨柜”从杭锦旗包下来又层层转包出去的大面积土地，

统由省政府按原来的包银折款收回。这些耕地的大部，交给合管处经营。

张遐民在参加“抗战建国讨论会”时，左派曾指出，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必须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不能开倒车。张认为这是国民党的耻辱。受命筹建“合作事业管理处”时，挑选了绥远籍中品行比较端正，且无不良嗜好的人作为骨干，然后以五原汉奸田全贵和刘子俊的“牛圈”成立了“和悦”合作农场，以临河丈量出的大面积公田成立了“永泰”、“永刚”、“太仁”和“太彰”合作农场。以“杨柜”包租下来又转租出去的原杭锦旗大面积土地，成立了“合作代营处”。五场一处的社员，原先都是地主的佃户，此时虽没有取得土地的私有执照，但得到土地的永耕权，故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再加上信用、供销等项合作业务的扶植，社员的生活亦有改善，虽因征兵要粮的干扰，使张遐民的理想无法实现，但总算起了一定良好的功效。傅作义将军参观了几个农场和“合作代营处”，很感满意，以这些作为试点，打算在后套和伊盟推广。

绥西自从五原战役以后，日军再未敢大举进犯，形成偏安一隅的局面。傅作义将军的部下，虽然在物质条件上，仍十分艰难，而精神面貌则趋向颓靡。但张遐民却道貌岸然，处处都作出奋发振作的样子，连“潘派”的人也说他装模作样，不过傅作义将军对他另眼看待。当张的父亲张殿杰，因他参加抗战被日本特务机关扣捕死于监狱后，他在陕坝东郊进行遥祭，各界人士有一千多人参加，傅亦到场吊唁，使他非常感激。

绥远省自民国以来历任都统、主席，都由自己任命民政、财政和建设厅长，只把教育厅由地方人士担任。傅作义将军在

抗战快胜利时，由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固，便把建设厅也交给地方人来领导。经过选择，发表张遐民为建设厅长兼合管处长。张受此重任，社会地位又大大提高，但并未自树一帜、另立派系，仍追随潘秀仁之后，不象一般政客那样朝三暮四。

七、反共失败与逃往台湾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张遐民随傅回到归绥，负责日伪遗留物资的接收工作。当时社会舆论揭发接收人员贪污行为，而对张遐民咸认为清廉自持，一尘不染。

日本投降时，“自卫军”第五路郭长清部首先进入归绥，把伪蒙“土业组合”的鸦片烟土大量劫收，因为好吃难消化。一九四六年春天，拿出大量烟土，派他的副司令辛裕如和驻归绥办事处处长贾汉卿给军政首脑和地方绅士送礼堵嘴，全都瞞过博作义将军收下，故无人出来检举揭发，唯独送给张遐民四包，除婉言谢绝，如数璧还外，并把自己抗战时期所备的两匹乘马赠给郭长清，很恳切地写了一封信，鼓励郭为国民党继续效力。此事被博作义将军得知，由于众人分了肥，牵涉面广，未加追究，可是对张遐民更有了新的看法，所以这一年改组省政府时，调教育厅长潘秀仁为建设厅长，任凉城的留美学生苏珽为教育厅长，将张遐民由建设厅长调为财政厅厅长。

张遐民在组织绥远财政厅时，对日伪遗留下的人材，比物资还要重视。他获悉包头以北的白云鄂博，发现了制造原子弹的铀矿，在迁送日本人回国以前，对白云鄂博的日本工程师和其它日本技术人员，不以俘虏看待，这些日本人很受感动，给他写下不少珍贵资料。日本人在伪蒙的各机关中培养出好多会计人员，在财政系统以内的，张遐民全部留用，让从后套回来

的会计受留用会计的领导。财政厅管理省县银行和税收机关，“潘系”中的不少人都想升占科长和局长等职位，但张却安排了新从重庆、武功和兰州等地大专院校回来的绥远大学毕业生。他的三哥张毓城想依仗他倒贩粮食，要他一张名片，使稽查人员验条放行，但不予通融。所以他抗战胜利回来，归绥东区的念书人，对他亦很感失望，二十家村的乡老，更骂他“六亲不认”。

国内战争全面展开后，张遐民目击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失利，统治区日渐缩小，财政上日益枯竭，深感大局已日落西山，奄奄一息。而军政人员，追名逐利，置国民党的危亡而不愿，内心焦急如焚，而又回天无术，遂于离开归绥以前，连续两年住室的春节对联，都写着：“挺起两根穷骨头”、“立定脚跟做好人”，以发泄其愤懑情绪。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傅作义将军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宣告北平和平解放。绥远的军政人员分为主和、主战两派。以董其武将军为首的绝大部分军政人员和地方人士，主张和平，发起了革新运动，积极酝酿起义；以潘秀仁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则因当时西安、兰州尚未解放，跑到陕坝成立了绥远省政府绥西行署，企图作垂死的挣扎。这时的张遐民，心情十分矛盾，承认自己半生从事政治没有下场，想退出政坛，应兰州西北大学聘请前去担任教授，但由于他讲义气，不忍把潘秀仁扔下，于春节后亦跑到陕坝，担任了绥西行署的副主任。当兰州快解放的时候，祁志厚从广州回绥远搬家，从祁口中得悉国民党将要放弃大陆，这才和潘秀仁从陕坝携眷而出走。他带着卜效夏女士和孩子们，走到兰州便感到旅费拮据，扔下一百块银币让卜效夏快回，自己跟上潘秀仁，好不容易钻

进飞机，跑到广州。

“九·一九”起义前夕，张遐民随徐永昌乘机来到包头，阻挠起义未遂，又原机出走，从此离乡背井，迄今已三十五年。

前年从美国回来的曾任绥远省政府代理秘书长的梁容若先生，和张遐民同在台湾私立辅仁大学担任教授。据梁说：广州解放后，张先逃到香港，一九四九年十月，即跟包头的牛进禄到了台北，潘秀仁后来才抵达。张潘最初一年非常狼狈，台湾当局根本不予理采。丰镇人参加过同盟会的前清秀才李苑林有个儿子叫李用宾，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曾在福建当过县长，抗战胜利后随陈仪接收台湾时，在台北弄了一处小院，腾出两间房子收容绥远的逃亡同乡，一间让给李正乐夫妇居住，一间让给刘汉、张遐民、牛进禄、潘秀仁及潘所带的一个儿子住下。张遐民和潘秀仁没有工作，生活靠刘汉、牛进禄和李正乐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薪金节余维持。张遐民虽然个性倔强，嘴上从不认输，但内心苦闷彷徨，为了托庇上帝保佑，在穷愁潦倒中，终于跪在十字架前受洗，成了信仰上帝的天主教徒。

张遐民把命运交给上帝以后，不像潘秀仁、陈国英等，因沮丧忧郁先后病死，而是苦苦挣扎寻求出路。他住的房子，不仅人多拥挤，而且阴暗潮湿，就在这样条件下，他圪蹴在破泼发上，翻阅史料，撰写文章，从事写作。一九五一年张遐民被台湾当局聘为设计委员，从此有了固定收入，但未中辍写作。终因阴湿侵袭，右手关节患病，僵直不曲。但他不心灰意懒，改用左手拿笔，继续写作。一卷卷文稿，陆续由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等机构出版，终于成为台湾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权威和研究大陆问题的专家，由此声名日嘈。一九六三年，他进入

私立辅仁大学担任了训导长和教授。

他今年已经八十岁。前年春节前给卜效夏来信云“手执秃笔陈三愿，一愿祖国统一太平万万年，二愿妻子儿女永平安，三愿来年能相见”。去年春节前来信，又有三愿：希望孩子们洁身自爱，勤劳工作，当会计的分文不苟，当医生的细心下药……。并说他所写的一部《绥远志书概论》，已经完稿付印。一个快要六十花甲的人才开始用左手练字，年过古稀尚不停笔，着实也令人感到惊奇敬佩。

一九五七年张遐民接到驻香港“中统”负责人的信，说是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将绥远国民党最顽固份子的三家家属，以汽车运往多伦劳改，卜效夏女士因体弱生病中途死亡，子女下落不明。他听到这一谣言，以为自己不但国破，而且家亡，格外悲伤。后来经过许多周折，终于托靠住美某友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通了消息，得知卜效夏女士不仅健在，并且担任呼和浩特市政协委员和内蒙文史馆通讯馆员，他的长男乃锋，锻炼成建筑公司很好的瓦工师傅，跟他身边长大的次子乃钧现为包头六二六医院的主治大夫，女儿凡铮为呼市运输公司的会计师。连潘秀仁和张庆恩的家属都得到很好的安排，子女都在文教部门工作。住美某友为张遐民家庭的事，去年曾在纽约的华侨《商务日报》上发表文章，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造惑惑众，并建议台湾当局不妨让这位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张遐民，先回大陆看一看。蒋方虽无反映，但在旅美侨胞中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

前几年，他给卜效夏来信说：在台湾出版了许多学术书籍。今年六月又来信说他写的“王同春与河套的开发”即将出版，“宋辽交战与杨业父子捐躯之时地考”业已完稿。看样子

张遐民已厌倦谈论主义，转向了研究历史，从他着意于王同春和杨业，说明他旅居台湾，多么怀念内蒙和他的山西老家啊！

综上所述，张遐民先生由于信仰不同决定了他所走的错误道路。论其为人正直清廉秉性刚毅，治学严谨，具有真才实学，生活艰苦朴素，从不同流合污，这些做人优点受到社会舆论称道。在旧社会他把命运寄托于国民党，一心想做一番事业，导致国富民强，民族振兴。然事与愿违，幻想破灭，又把命运托付与上帝。三十多年来，他漂泊孤岛，怀念故乡，静观变化，明察是非，终于离经叛道成为一位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志士。我们相信张遐民先生的“三愿”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圆满实现。

革命熔炉

回忆绥远省军政干部学习团

耿泽山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和平解放。原绥远省的军政干部光荣起义，投入革命。为了尽快实现起义部队解放军化，绥远地方解放区化，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归绥市成立一个教育机构，以教育、改造起义干部，于是“绥远省军政干部学习团”就应运诞生了。笔者有幸曾参加了学习团第一期学习，亲身经历了这一冶炼过程，愿将该团的概况，凭个人的见闻与体会作一片断的回顾与记述。

学习团成立于一九五〇年二月，校址选在麻花板日寇占领期修建的营房。一月间由石家庄高级步校调来的一批军政干部来到归绥市，当时称“东来干部”。他们会同军政委员会抽派的人员，进行了团的筹建工作。傅作义兼团的主任，高克林任政治委员，副主任张如三、副政委牛克伦负团的实际领导责任，团部设总务、教务等几个科室，下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为军官队，由原绥远指挥所军官总队的全部无职军官组成，约一千多人，共编为九个中队，其中第一、二两中队的学员全是原来团级以上无职军官；第三至九中队学员是营、连、排级

干部，第二大队是由原绥远省各级政府人员组成，同时编队入团。

在一个寒风凛冽雪花飞舞的早上，原绥远指挥所军官总队总队长宋海潮把全总队一千多人带到麻花板营房大操场。学习团张副主任、牛副政委率第一大队各级干部同时到达。很快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接仪式，这一千多军官队员瞬间就成为学习团的正式学员。随后即照事先拟定的编队名册，逐个唱名编成九个中队。各队干部即把队伍带到指定的营房，开始了一系列的学前准备工作，如分班、整理内务及环境，换发军装符号等等。当学员们穿上解放军的棉军衣戴上“八一”帽徽军帽时从外貌到内心都有一种去旧更新的感觉。我被分在第二中队，学员多数是团级军官，有少数当过师旅长的。队领导干部都比较年轻。指导员田怀宝、中队长张廷喜及副指导员等都是工农出身的营级干部，看来精干有为，和蔼可亲。就这样结成了一个团结改造的战斗集体。在我们入团后的某日，学习团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教学活动。学习的内容主要是社会发展史及时事教育，另外安排一些经常性的劳动，使学员树立劳动观点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是这一批刚从国民党的旧营垒起义过来的军政人员，要很快在政治立场思想作风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较比签订一纸起义协定还要困难的多，事实正是这样，在几个月的教学过程中，从被改造的学员来说，经历了痛苦的脱胎换骨的冶炼；从担负改造任务的干部来说，他们在团结改造方针指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武器进行了无数的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耐心细致，以身作则的说服教育工作，最后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基本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若问究竟他们做了哪些工作？仅从

我所在的二中队举几个实际事例，就可以明瞭其梗概了。

(一) 良好的开端

编队那天，因为我们二中队的营舍尚待修理，上级决定二队暂住公主府师范学校（该校已放寒假）。队伍到后，分配了各班的住室，进行了简单的整理，时间已到中午。外面飘着雪花，天气很冷，我班的学员正围炉谈天，等候铃声开饭。突然指导员田怀宝和队长张廷喜等队干部亲自端着一筐箩热腾腾的馒头和一盆香气扑鼻的肉菜以及碗筷走进房间。他们笑容满面把饭菜放在桌上，象对待客人一样说：“饭不太好，请同志们吃吧！”这一出乎意外的“突然袭击”，真把我们惊呆了，只觉得一股暖流输入到每个人的血管，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几秒钟后，才不约而同地说一声“谢谢指导员、队长……”。吃完饭以后，我们三四个同学赶紧把碗筷餐具送回后院厨房，自己刷洗了一下，回头看到队长、指导员等正围在一张矮桌上吃饭，无意间发现他们吃的是素菜白菜山药蛋，这又使我们奇怪不解，回来的路上，几个人叨咕着，为什么我们吃肉菜，队长他们吃素菜，这是怎么回事。回到班里，好象卖“号外”的报童，把这事兴致勃勃地转告其他同学，大家听了，也象得到一件有趣的新闻一样，七咀八舌不得要领地嚷嚷了一阵，事后才知道因为我们队的学员原来都是团级的，所以仍按团级待遇吃中灶，伙食标准是十八元，队长、指导员他们是营级干部按解放军制度应该吃大灶，伙食标准十四元。通过这件事，使我们第一次认识到革命队伍这种团结友爱热诚相待以及严格执行政策和制度的优良作风，大家赞叹不止，深受感动，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二) 破格的照顾

我们第一大队的学员，多数是携家带眷的无职干部。家属都散居在新、旧城的住户家，生活费用断绝来源，仅靠学员每月领到几元生活补贴是不能维持妻儿老少全家生活的。但解放军当时是供给制，规定团级以上的干部才准许带随军家属，享受供给待遇，而第一大队多数学员是营级以下军官，按规定家属不能发给生活费。因此，很多学员背着后顾之忧的包袱，不能安心学习。团领导了解这一情况后，把问题反映给军政委员会。过了不久，高克林政委给全团学员作报告时，特别讲到家属问题。记得高政委说：（大意）关于你们家属的生活问题，已向中央请示过了。由于绥远学习团的学员已经是解放军的干部，目前的家属生活问题应实事求是加以解决，为此决定“不论级别，全包下来，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不要为此顾虑”。会后，由各队经过申报调查登记，凡有家属的学员，每月按人口发给粮食和菜金，这一破格的照顾，象是一颗颗定心丸，使学员们又一次感到党的温暖，对后来的学习起到鼓舞作用。

(三) 傅作义将军来团讲话

三月初傅作义将军从北京来到归绥。一天的下午学习团全体干部学员集合在大礼堂等候傅将军前来讲话。

学习团的学员，绝大部分是跟随傅将军的老部下，自从“九·一九”起义前后，大都没有再和傅将军见过面。这天突然傅将军要来讲课，大家的心情非常兴奋，渴望听听傅先生要讲些什么，大家静静地等待着。

果然傅将军在张如山付主任陪同下，来到大礼堂。还是那样的朴素，那样的风度，那样的和蔼。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这伙学员曾在他的率领下与日本侵略者多次周旋、拼搏过。当时在日寇严密封锁下，后套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总算挺过来了。但是在解放战争，不到三年，国民党部队，竟全部崩溃，终致蒋家王朝覆灭，大陆全部解放，这是什么原因。那时傅将军的部下，只认为是蒋介石集团的嫡系部队腐败无能所造成的，而对傅作义这一军事集团的本质，没有明确的认识。在这天的讲话中，傅将军有针对性地阐明了这一点，纠正了这些老部下的糊涂认识。

傅将军在讲话中说：“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三年我把你们带到错误的道路上，给地主阶级当了看家狗，给大资产阶级保镖，违反了劳苦人民的意愿，违反了历史的潮流，终于遭到了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结局（基本上是原话）”这几句话真象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闭锁的思路，启发引导每个人重新考虑问题，重新认识傅集团的本质，进而对自己的这段历史作出新的估价。

傅将军的讲话，在讲到起义问题时说：“共产党、毛主席多少年来的所作所为，我是敬佩的，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起义政策感召了我，毛主席提出的缓远方式感召了我，再加上许多老朋友、老部下的殷切希望和热情促动，我们不能再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于是我才毅然决定带领你们走起义的路，走革命的路（大意是这样）”这话说的多么实在多么中肯，台下学员在激动的情绪下，很多人流下兴奋的眼泪。

傅将军接着又说：“有人骂我们不忠，骂我们无耻，骂我们屈膝投降。我却认为我们是脱离黑暗，走向光明，脱离反

动，走向了革命，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是光荣的，要坚定地走下去，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下去。”在这批学员中有不少人带着矛盾的心情来到学习团，在思想意识和过去藕断丝连，既向往未来，又眷恋着以往，傅将军的这段话，正象一把利刃，帮助怀有这种想法的学员，斩断思想上和过去的纠葛，坚定地走到革命的怀抱中来。

傅将军近两个小时的讲话，都是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对全体学员的学习改造起到很大的启示与鼓舞作用。当他讲话完毕走出礼堂时，全体学员肃立目送，直到他的身影消失。

（四）突破劳动关

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一贯认为劳动是下贱的，根本看不起劳动人民。改变这种错误观点，是思想改造的重要一环。学习团在进行《社会发展史》的教学中，把劳动创造世界作为重点教材，为配合教学，队上安排了一些劳动，如修补校内外的马路、种菜、植树、掏厕所等等……。最初有些学员对此有些想法，甚至错误地认为是变相劳改。扭转这种错误认识，光靠说教是不行的。有一天队干部率领全队清理营房的厕所浇灌菜地。厕所是深坑式的，约四、五尺深，粪水积有大半坑，先是用长勺一勺勺往上掏，这样做速度太慢，因为掏出的粪水，还要全部送往菜地，很多人在坑上等着，实在窝工。队长命令要两个人下坑用小桶掏，岸上的人往上提。这又脏又臭的活让谁下去呢？队长没有指定，等学员自报奋勇。这时学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打这个头。张队长看到这情况，没再说话，马上脱掉上衣和长裤，拿起小桶毫不在乎地下到大腿深的粪坑干起来，同学们看在眼里，愧在内心。不一会儿争先恐后脱衣下坑

把队长接替上来。掏上来的粪水需要担或抬到二里以外的菜地里。大桶两人抬，小桶换班挑。只见田指导员和副队长抬着七八十斤重的大粪桶，雄赳赳地走在前面，这又激发了同学们的积极性，担的担，抬的抬，不到半天，把一个大粪坑整的干干净净，真所谓身教胜于言教。深深感到在国民党部队这是不可思议的。后来通过修马路、挖地种菜一系列劳动，学员们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逐渐扭转了过去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思想，对劳动创造世界，有了切身的体会。起初扛着铁锹锄头在街上走，遇见人就脸红低头，后来反觉得有光荣感了。

（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术语，在旧军队中是闻所未闻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上级对下级只有奖励与训斥；下级对上级只有恭维与服从；同级之间也只有当面说好话，背地踢脚。把所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奉为处世哲学。学习团开学不久，指导员布置以班为单位每周开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可难为了学员们。记得我们班第一次开生活会时，起初谁也不发言，有的低头读书报，有的仰着头看天花板，会场沉默了好久。班长开始动员了，他说：指导员讲得很清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的是让我们互相帮助，克服生活学习中的缺点……话没说完，一个同学斜楞着眼很不耐烦地讽刺道：“指导员放个屁都是香的！？”这一闷棍，打得班长十分尴尬，会就开不下去了。又有一次，政治课测验，题目是：“写一篇学习心得”。教员布置是让各班民主评卷，定出分数。每人先把自己的卷子念一遍，然后大家提意见定分，这在革命部队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我们班评卷时，情景却十分紧

张。记得第一个是评一位姓牛的同学，当让他读自己的答卷时，他精神紧张得不得了，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流，他是唯恐同学挑他的缺点，随后依次轮到别人，大都也是神态很不自然。在大家发言评卷时，只讲好的，不讲缺点，最后评的结果都是一百分，只好另麻烦政治教员了。随着教学的进展及多次开会锻炼，才逐渐习以为常，初步掌握了这一武器。毛主席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又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事实确是这样。

（六）思想交锋

学习团的基本任务，是促使学员立场观点的改变，也是教育过程中心的一环。团领导针对学员思想上存在的许多错误认识，进行了多次的教育说服工作。采取的方法是鼓励学员打消顾虑，敞开思想，大胆地暴露自己的想法，通过民主讨论和争辩，把是非弄清楚。有一次，田指导员在讲话中说：“抗日战争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当时学员们听了这句话，很多人思想搞不通，大家认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最高统帅明明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日部队有几百万人，而共产党的部队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几万人，许多较大的战役，多数是国民党部队打的，怎么能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呢？田指导员听到这样反映后，针对这一问题，让各班展开讨论，最初持否定态度的占多数，少数人有了正确的认识，往往争论的面红耳赤延续到深夜。田指导员、张队长每晚都参加到各班听大家发言，最后集合全队作了总结发言，他着重讲了以下几点意见

（大意）：（1）抗日统一战线是通过“双一二”事变蒋介石被迫承认的；抗战兴起也是蒋介石在国内爱国军民重大压力下发动起来的。（2）在八年抗战过程中，每到关键时刻，如南京失守，武汉沦陷，蒋介石集团即悲观动摇，甚至出现了汪精卫逃跑投敌建立南京伪政权的丑剧。是共产党一再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才使抗日战争得以进行到底获得最后胜利。尤其是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这篇光辉著作，鼓舞了亿万军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也坚定了国民党军队中爱国军人的抗战意志，消除了当时一些“抗日亡国论”者的邪说。（3）抗日战争是全民的卫国战争，仅靠几百万装备落后的正规部队，是战不胜武装到牙齿的凶恶日寇的。抗战初期，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曾与日寇打了几次硬仗，如淞沪、鲁南、临沂、台儿庄等战役，但都不能阻止住敌人的凶焰，还是节节败退，到中后期被迫退守西南山区，大片国土沦于敌手。这时共产党以八路军新四军为基干，选派大批干部深入广阔的敌占区，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拿起刀枪进行了八年英勇残酷的游击战争，使敌寇泥足深陷，进退失据，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包围之中，最后在盟军配合下，不得不放下武装无条件投降。所以从抗日战争过程及本质来看，不正说明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吗？”这一席有理有据，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断，说服了绝大部分有疑义的学员。除此之外，学员们还提出不少带争论性的问题。例如，对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没收他们的资产？为什么不收复香港？为什么承认蒙古共和国？进入东三省配合进攻日寇的苏联红军为何拆走沈阳兵工厂的机器和运走收缴敌人的武器等等，都是通过讨论争辩得到正确的思想认识。就不一一赘述了。

正当学习团的教学轰轰烈烈的进展，学员中涌现出很多学员先进分子的时候，这时，外面刮起了一阵邪风，提出什么“整体进步，反对突出”，企图破坏起义人员的思想改造，保存旧的思想体系，这一反动口号传到学习团后，一时引起了部分学员的思想波动和疑虑，团队领导为清除这一毒素的影响，曾组织学员通过大会小会进行了批判与斗争，揭穿了制造这一口号别有用心者的阴谋，使教学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七）观看白毛女演出

在学习后期的一天晚上，军区文工团为我们团演出一场歌剧“白毛女”。演出结束后，各队回去座谈观后的心得与体会，在座谈会上，有的学员只谈几个主角的演唱技巧，认识不到这出戏的主题思想，谈不出什么心得感想，还有的同学认为故事情节不太真实，还举出杨白劳被迫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捺手印作为例证，也有的人认为通过这出戏看到大地主黄世仁及其狗腿子的阴险狠毒毫无人性。同情杨白劳父女的悲惨遭遇，但还认识不到这是旧社会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典型事例。

最后，辅导讨论的干部发言指出：这出戏生动地揭露了旧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本质，它反映了在旧社会地主阶级是如何残酷剥削压榨穷苦农民的，不消灭地主阶级，农民就永远翻不了身。这出戏在老解放区演出时，许多苦大仇深的人，追忆起自己家庭的苦难遭遇，都流下了眼泪。当看到公审场面对，高兴地呼喊口号，焕发出深厚的阶级感情……。

同学们听了这一发言后，觉察到入团以来，虽然学习了一些理论，但阶级感情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也意识到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出戏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

说。

(八) 丰硕的成果

学习团第一期，经过六个多月的教学活动，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千多名起义军政干部，从政治思想到生活作风，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革命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对共产党建立了一定感情。二中队有一个学员把自己在解放战争中为蒋介石卖命有功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主动拿出来交给组织上；一中队一个当过团长的学员王某主动把私藏的五支手枪交出来，还有极少数原来染有鸦片嗜好的学员自觉地戒掉了烟瘾，另有一批年轻的学员被吸改加入共青团。

一九五〇年七月，第一期结业，少数人分配到起义部队及原单位，大部分分配到地方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心情舒畅愉快地走上了不同的革命工作岗位。第一期结束后，紧接着举办了第二期，这期学员主要是起义部队选送来的现职军官，另外有一部分无职干部招待所的军人。第二期同样进行了六个月的学习，收到良好的效果。两期一共集训了四千多人，对起义部队的解放军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1951年度第二期结业，学习团完成了特定的任务，胜利结束了。

东桃地区骑兵指挥部的始末

杜海荣

解放战争在东北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华北国民党军已至穷途末路呈现垂危局面。在这样风云飘摇大势已去的不利形势下，“华北剿总”仍幻想扶大厦于将倾，使尽一切办法，极力拼凑与搜括兵源，企图撑住行将覆灭的局势。通过整编骑兵第十三旅的勉强成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在我把亲身经历的“东桃地区骑兵指挥部”的经过，如实地追述出来，足可以说明当时“华北剿总”已临强弩之末的窘境。不仅军政方面矛盾重重，而且军民之间的对立，已经到了激化的地步，败象毕露，势难挽回了。

一九四八年，我在国民党整编骑兵第十二旅任参谋主任，随军在凉城县新堂休整。八月的一天，接到博作义将军的电报，调我为整编骑兵第十三旅第二十五团团团长，并令速到驻绥指挥所董其武主席处报到。我在赶赴乔汗奎县长等举办的欢送宴会后，即率警卫六人，星夜到达卓资山，乘火车驰抵归绥，晋谒董先生。董先生热情地接见了，谈了整编骑兵十三旅报经中央批准的经过。

整编骑兵十三旅，是“华北剿总”根据战局扩大，部队不足，顾此失彼，难于应付的情况，向国民党中央请准成立的。

按规定部队番号只要冠以“整编”二字，不仅是正规军，而且是完全新式装备部队。可是整编骑兵十三旅，只是一个空头番号，人员马匹俱无，须以绥远地方武装拼凑，并由地方人利用地方人的优势，分头招募。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只要能达到扩军的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了。

面对这样的境况，我忧心忡忡，日夜考虑全团一千多骑兵，怎能招募够数呢？特别是千余匹军马，如果没有上级的补充，光靠招募，那真是难如上青天的事啊！在归绥住了些时，好不容易把傅先生新选定的旅长高理亭（原系骑兵第四师的副师长）等回来，他是和整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从北京“总部”一同相随飞回归绥的，在机场上首次相见，略事寒暄，便偕入呼市。当时全旅只有旅长和我二人及十多名随从人员，连个住处也没有，权且住在整编骑兵十二旅办事处，进行筹建。经过一段时间，旅司令部迁驻察素齐镇，稍事就绪后，便积极开展招募人马的工作。

该旅二十五团的干部只有我一人，怎么办呢？我便商妥骑十二旅，提级抽调了两名连长及一名军需，因陋就简地成立起团部。招募一千多骑兵，着实困难。我再次去见董先生，董先生出于爱护和照顾，命令我到东胜专员公署，由张国林专员协助，把挑力民办事处所辖的两个骑兵保安团约四百多骑兵改编进来，不足数另行招募。当时我喜出望外，迅即衔命率十余人到达东胜，见了张国林专员。说明来意后，张专员呻吟了许久，然后才慢腾腾地将挑力民的地方骑兵部队情况作了介绍。听了他的话，使我如梦初醒，这样的地方武装根本就不可能改编。主因是：挑力民办事处的地方保安团队地方性根深蒂固，团队的大小头目，均为当地绅士和富户，他们掌握这支兵力，

既可保卫自己的财产，又能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根本不愿离开他们的土围子参加正规部队上火线作战，至于士兵们均为逃避拔壮丁才加入的，他们肩负着全家生活重担，不愿抛妻撇子、背井离乡，远出当兵，特别是挑力民与乌审旗毗邻，稍一不慎，就有激变的危险！此外，挑力民地方团队，虽只有四百多人，但有两个团的番号，两个团长呼凤翼、蒋吉祥，都是当地实力派人物，如以一个团的名义进行收编，降低各级干部的官阶，他们也不干。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商拟了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即不提建立二十五团的事，而改其名曰：“东、挑地区骑兵指挥部”，以这样堂前皇之的名义，统辖当地两个团，名正言顺，俟其听从指挥一切就绪后，找个适当机会，一诓过河，改编成团，方不至激变而发生意外。商妥之后，我即返回归绥见董先生，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建议。董先生完全同意我和张专员的意见，当即委我为“东桃地区骑兵指挥部”的指挥官，让我指挥东桃地区的保安骑兵部队（实际东胜没有骑兵，只是挑力民的四百多骑兵），等待机会再行渡河，达到改编的目的。

当我返回东胜后，张专员鼓动我大张旗鼓地宣耀一番，先挂“东桃地区骑兵指挥部”的牌匾，宴请各界人士，大造声势，以利今后工作的开展。我觉得用这欺骗手段，实在问心有愧，再加我不善于来这一套，所以没接受他的建议，也没向当时驻东胜的伊盟警备司令陈玉甲作很好的求援，便匆匆以指挥官的名义到了挑力民。挑力民办事处处长傅观澜与我会面了解来意后，将全体保安骑兵部队集合起来，和我一同进行了检阅，检阅后，便当众宣布了董先生的命令，并作了模棱两可的些保证。经过这一番做作，总算初步搭起指挥部的架子，安定了军

心。

怎么能把这些骑兵骗过河东改编呢？经过一段接触与观察分析，还有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即须预先解决好办事处处长傅观澜的去就问题，使他有了适当的职位，能够随军安全体面地离开桃力民，才能谈到部队东调改编的问题，否则，他会从中作梗，事情不能顺利进行。于是我二次返绥，向指挥所汇报了这种情况。董先生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便决定：傅观澜候其协助把部队带过河东后，将来可升任整骑十三旅副旅长。不过，这一决定现在不能声张，待时机成熟，再行宣布。熟知我将董先生的意图及决定密告傅观澜后，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当地。原因是傅在桃力民当处长多年，急愿将此升迁喜讯传出去，起到某种微妙作用，有一个光荣体面的离职结果。这样当地保安团队归整骑十三旅改编的圈套，暴露无遗，部队东调，更增加了困难。不过，傅观澜的顾虑消除了，他和我团结，间无共商东调策略。不久新任办事处处长王培仁到达，接替了傅观澜的处长职务。

正在苦思冥想，筹划诓骗渡河之时，八路军围攻包头战役打响。这样一来，不但没法渡河，而且由包头转运军需的路也断了，人心惶惶，一日数惊。在此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新任处长王培仁利用处长职权，召集桃力民有关绅士，宣布成立防共司令部。地方绅士们选王培仁为桃力民地区防共司令，指挥桃力民地区军政及各界所有力量，进行防共活动。我所统辖的呼、蒋两个团亦归其控制与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成了光杆司令，走投无路，只好听天由命，等候局势的演变。

包头战役结束后，我和傅观澜又重振精神，决心率部北上过河，不料集结在桃力民附近的各队，预先发现各种徵象，竟

于出发前夜，分头逃窜，哗变一空，只留我和傅观澜及随行人员。怎么办呢？只好用怀柔策略派遣有关联络人员，追踪各队，向他们晓以利害，希望他们别走极端。经过疏通劝慰，有几个队接受劝告，全体武装来指挥部门前，要我当面表明态度，连马都不下，防备我对他们的惩罚。当时空气紧张，一触即发。我的警卫员见事不妙，手枪出壳，以防不测。我喝令他们后退，并把我所佩带的手枪当众解下交警卫拿走。我赤手空拳，单人和部队见面，以精诚感召，劝说他们千万别走极端，各归驻地，听候善后处理。我说：我们都是当地人，闯下祸后患无穷，一切我们可以从容商量，这才是合情合理的行为。这时大家对我由怒目而视，逐渐缓和下来，最后他们各归原驻地，使这次冲突没有酿成大祸。这是头一次出发过河的结局。

经过一次失败，我们反复考虑，并和呼、蒋二团长及比较可靠的大队长共同研究，决定由他们施加影响，充分动员，婉言劝说，又准备第二次出发。不料当面说得妥妥当当，但在出发当天的晚上，又哗变一空，有的队竟然拉走窜到乌审边界沙漠中，只留下一位吴大队长。这又该怎么办呢？我和傅观澜相商决定到东胜一行，一方面想和河东后方取得联系看有什么有效的指示，另一方面打算求得伊盟警备司令陈玉甲的帮助，因为他与傅观澜关系很好。这叫“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我们抱着一线的希望，狼狈地到了东胜，不料陈玉甲司令，由于我到东胜后没有过多的巴结他，早已对我不满，所以只接见傅观澜而给我一个闭门羹，因怀恨我，简直对董先生的意图也抛之九霄云外。最后没办法，我和傅观澜又硬着头皮，冒着危险回到桃力民。各队听说我们从东胜返回，又各自拉入沙漠中隐蔽。经过各界人士的疏通折中，最后决定，由呼、蒋二团长以

地方私人关系，采取自愿原则，动员所属，愿走者更好，如果有人不愿离开家交马亦可。就这样，呼、蒋二团长勉强各动员好七、八十名骑兵，连同招募及购买马匹，总共没凑到二百骑兵，提心吊胆地带回萨县。

至此，对上级以二十七团（因二十五团番号重复，奉命改成二十七团）的名义，列造了名册报请备案，对下仍以骑兵指挥官的假名义，统辖呼、蒋两个团（每团只编两个连，每连只有五、六十人）及由河东招募来的一些部队。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起义前不久，局势已经明朗化，官兵从思想上认清了只有起义这一条路可走，重返桃力民妄图以蝼蚁之力抵制革命，将被淘淘洪流所淹没，不会有好下场，这样才使呼、蒋两人同意，并通过他两人做工作，按二十七团正规建制，顺利地把两个团改编成两个连，并报经上级免去了我的指挥官头衔。这就是东桃地区骑兵指挥部的始末情况。

通过以上事实。内部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反共不得民心的客观现实，种种行将覆灭的迹象，都可以作为编纂地方史志时的参考，因此，不揣文字的谫陋撰写出来，以补当时东桃地区史实的空白。

段履庄之死及其他

郎 正 之

呼市当年炫赫一时的大盛魁的最后一任经理段履庄，在外蒙古独立后，收拾残局，又在呼市改营电灯面粉公司，前前后后，都已见于史料。现在只补充一些不为人所知的轶事。材料主要是段的小儿子、现已六旬的段墉川提供的。段有二子：长子为元配夫人所生，是个花花公子，现已不知下落；小儿子段墉川为达茂旗的蒙族夫人所生，194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是国内知名的内燃机专家，现任西南交大教授。唐山地震时除段本人在峨眉外，妻子儿女及孙儿女均在唐，竟因各种偶然机会一无伤亡，真使这一家喜出望外，也是老段生前友好和小段的朋友们十分欣慰的。

段履庄广交游而轻钱财，晚年破产后即常住本市，直至1948年被害为止。他的朋友中多为蒙族知识分子和原地方士绅。他性超脱，从不参与地方派系之争。如陈国英是反闫锡山派的极端分子，1947年因打死纪守光案被关押期间，作为一名下台的山西巨商，虽然自己早已靠典当度日，却常常购买珍馐美味，亲去探监。他的另一性格是好施舍而不求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虽将其身边唯一的儿子打发到后方求学，自己却因无力西迁而困于呼市。其实他明知曾经受过他资助的人中，当时已有不

少阔老（其中就包括孔祥熙），却既不愿自己求助于人，也不让他小儿子知道谁曾受恩于他，只是勉励他的儿子自立自强。段墉川入川后，在重庆街头碰到了淑蓉（陈国英的女人）后，丁优礼接待，并表示段父有恩于她家。段在丁家住了几天，便考上了高中，并未接受丁的馈赠。

1939年段墉川与旅渝同学会的代表，一道看望到重庆开参政会的绥远士绅张钦等，碰到民国初年在归化城办过纺织厂的李石斋先生。李与孔祥熙、段履庄都是晋中邻县同乡，彼此都很了解，也曾是朋友。当李石斋知道段墉川是段履庄的儿子后，便说：“老孔发家前，出洋留学时曾借过你父亲二百两银子，你父亲破产后，孔已成为财阀，你父亲一贯只放帐不要帐，老孔装聋作哑，无意报偿，众朋反对此都有议论”。李石斋还自告奋勇，设法让孔祥熙接见段墉川，目的当然是让老孔周济一下只身流亡在外的穷孩子。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都为段墉川高兴，可在场的立委祁志厚等老士绅却未置可否。事后才明白我们对老孔根本不应该抱任何幻想。孔祥熙约好接见段墉川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住在国府路孔公馆附近的一个小店里等“好消息”。结果却是孔对年仅十四岁满脸稚气的小孩子段墉川象审问诈骗犯似的提出了许多严厉甚至带有污辱性的问题。当他认为小段确系他的恩人（或债主）段履庄的儿子时，只从身上摸出五元一张的“国币”，递给小段。当时段墉川虽然感到受辱，羞于接受，却又不肯不要。事后我说：“你该随手赏给他身边的人，然后告辞”。他说了句有辱父命的话，便掉下了眼泪，我们也就不忍再说什么了。第二天，后防勤务部政治部主任段绳武约我们到他的驻地——重庆江北龙头寺吃饭时，我忍不住又提到这件事。段绳武和他的夫人几乎同时说了一句“真是为

富不仁”。对孔祥熙这类阔老用这句古话评论，可谓入木三分了。

段履庄晚年迁往舍勒图召后院居住，一方面是生活困难连住宅也卖了，一方面是为了少受汉奸特务的干扰。日军进城前夕，一些大商号的头面人物曾派吴××游说，想请他牵头组织维持会，遭到他的严辞拒绝。日本特务机关的头头曾亲自登门拜访，妄想以高官厚禄诱他出山。段早已料到敌伪会有这一着而在屋子里陈设了佛象、佛经、香火供器等，因而得以年老多病，终身奉信佛事，做一名虔诚的居士为名巧妙地拒绝了。当时日本特务机关比起警察、宪兵以及日军头头更了解情况，且与上述机构矛盾很大。在做法上也更藏而不露，故未再找麻烦。但宪兵队的特务、本市人白玉却认为段家家大业大，深信“船破了还有三千大钉”呢。于是一再敲诈勒索，使段履庄夫妇整日不得安宁。最后虽连佛象、供器也被白玉强索而去，白仍不肯罢休。1938年秋白玉亲自带领宪兵把段带走。在这之前，一个与段有世交之谊的蒙族青年夜间到段家报信，说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一个青年，在严刑拷打下，供认段给了他衣物、金钱供他逃向后方之用（段壖川认为此事可能是因其父既不当汉奸，又满足不了白玉的贪欲，敌人故意设下的圈套。）并劝段履庄速到集宁暂避一时，以防再生事故。段说：“跪着生不如站着死”。被捕后，经亲朋多方营救，临死前才被放了出来。回家时已经遍体鳞伤，话也不会说了。据当时到段家探望过段老的孙如林（蒙族，1966年尚健在，家住北京）说，伤势最重的是头顶，可能是倒吊起来拷打跌撞所致。出狱几天之后，这位北方商界巨子，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老者，便与世长辞了。

写大盛魁，写段履庄而不写其死，愧对死者，也无益于后

人。呼市文史资料编辑办公室征稿，谨以所知见报。

附：段墉川曾提出两位知道细节的人要我找他们证实上述情况。言外之意是防溢美之嫌。我认为段本人是位正直的知名学者可以信赖，再则以段老的声望当个汉奸是可以摆脱困境，苟安一生的。这点为当时政界人士所公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白玉解放前安然无事地逃往兰州，买了汽车自己跑运输，依然很阔气。解放后人民政府将白逮捕归案。人民司法机关特别派人找到段老的夫人既表示慰问，也请段老夫人出庭证明白玉罪行。白玉已被处决。这都证明段履庄确实是一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者。

塞外满族拳师—关德山

张 静 文

关德山先生是塞外武坛上一位远近闻名的拳师。他一生热爱武术，为人正直、注意武德修养。他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不同的时代，一直坚持武功锻炼，培育后进。建国以后，关先生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成立武术锻炼站收徒教武。十余年来数以百计的学生在他的辛勤栽培下成长起来。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对新社会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时常对学生们说：“只有今天，才能使武术运动发扬光大。你们要珍惜时光、刻苦习炼，切勿松懈。”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后，社会上掀起极“左”逆流，祖国文化遭受践踏。武术运动被看作“四旧”。关先生苦心经营的武术锻炼站被洗劫一空，先生所藏许多武术典籍和毕生经验总结皆被焚毁。一九六八年先生含怨与世长辞。关先生去世十五年了，可人们一直没有忘怀这位著名的武术教师。

关德山先生是绥远新城满族人。绥远城的“关”和“郭”两姓，原系今吉林省安农县一带的瓜尔佳氏部落。早在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征服满洲各部建立后金时，瓜尔佳部落被纳入满洲镶兰旗。清军入关前，满族人对三国时代的关羽十分崇

拜，所驻城堡多建有关帝庙。“瓜尔佳”的读音恰与“关”字相切，与“郭”字亦通韵。所以清军入关后，这个部族便姓了“关”和“郭”，一直沿用至今。雍正年间，这个姓氏中的一部分随军驻在山西右玉。乾隆三年绥远城竣工后，右玉的建威将军率八旗兵进驻绥远城，他们便随之迁来定居。

清朝末年慈禧主政，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绥远城的部分满族人，对主张改革图强的光绪帝颇为崇拜。因此，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关先生出生后，家里给他取名崇绪，字德山。

关先生的祖父名叫昌祥，是绥远城十二家协领之一，时人称之为昌嘎拉哒（满语协领之意）。辛亥革命前，绥远城内设有专供满族子弟习武的炼功房。儿童时代的关德山就已与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天都要到炼功房习武。光绪二十七年朝廷推行“新政”后，绥远城将军信恪在启秀书院（今新城南街一号大院）东，创立了绥远第一所军事学府——武备学堂。二十九年贻谷接任绥远城将军，加强了对学堂的管理和建设，增加了训练项目。在武备学堂选拔体格强健、并且有一定文才的满族青年时，关先生应选进入学堂学习。由于他体质很好，又能认真锻炼，在学堂中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民国建立以后，关先生为生活所迫，先参加了以满族官兵为基干的绥远混成旅，在李春秀的骑兵部队中任排级军官。民国十一年转入归化城的马巡队。这时，关先生有幸结识了形意拳名师张魁武。

张魁武是河北省涿鹿县人，为近代形意拳祖师郭云深的门徒。他在军阀割据内战频起的年月里，为了谋生度日和游访交结武林豪杰，于民国十五年来到归绥，以街头卖艺糊口。是年关先生正在马巡队供职，归化城发生了一件抢案。马巡队怀疑

此案是张魁武所作，便名抡劫嫌疑罪名将张拘捕，交给关先生看管。抢案发生前，关在街头曾看过张练武卖艺，发觉他武功非凡，早想结识，始终未有机会。今与其攀谈，见其通晓文理，讲究武德，精拳术，重义气、一派豪杰气概，根本不像行凶作恶之徒，遂有意与他深交。因此，关先生四处奔走，疏通各方，使张得以解除嫌疑。事后张深受感动地对关说：“这些时多蒙你照应，我只身穷汉，今日无法酬谢。日后定将报答”。关先生忙说道：“我自幼喜武，但因无名师指教，未有长进。今日有幸巧逢师傅，万望多指教弟子”。张见关先生求学心切，诚恳相留，便答应了关的请求。此后，关先生以自己的微薄薪水供养张魁武，每日从师学习武艺。张一来蒙受关先生的照应，二来见关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而且肯于吃苦，认为他定有作为，所以格外精心传授技艺。关先生经张魁武的言传身教，自己勤学苦练，细心领悟，反复琢磨，没用多久便掌握了五行拳、连环拳、八式，杂式捶、十二形等拳路，和劈、崩、炮、钻、横、展、截、裹、跨、挑、顶、云、领五行八法要旨。张魁武所授之技为重步行意，特别强调腿上的功夫，要求练得双腿站立如生根，脚踏石碎重千斤。意在技击拳脚并用，拳取其身，脚踩其足。对此，关先生更是心领神会反复苦练。后来练得拳出生风，踩足地动。每打完一套拳，地面上总留许多较深的足迹。张见关先生武功已成，便告辞还乡。临行前张再三告诫关说：“习武应以防身健体为宗旨。所传之术能伤人，日后切勿随意与人争斗，恐有不测”。关先生谨遵师训，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里，从不与人争强斗胜，就是和人切磋技艺时也万分小心。

三十年代的绥远武术界枝繁叶茂，流派众多，人才济济荟

萃青城，对归绥武术发展有着很深的影响。流传颇广影响较大的门派有：赵老同（山东人，同治年间旅游塞外，居于莎拉齐水涧沟门，传说为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的阴把枪，亦曰缠枪，董海川（河北人）的八卦掌，吴（鉴泉）氏太极和杨（澄甫）氏太极，郭云深的形意拳，嵩山少林拳，山东太祖拳，以及长拳、华拳、螳螂拳等。自关先生从师张魁武之后，河北形意始流入绥远，经关传播，习者众多，独为一派。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关先生离开了马巡队，在省建设厅谋了一个传达长职务。自此便开始了他的教武生涯。建设厅在新城北街，庭院宽敞平整，适宜习武练拳。于是关先生便借此方便条件收徒传技，从其学武者终日不断。这个庭院一时成了习武校场。当时关先生生活虽然困难，可他从不因此而向学生索取分文。有的弟子念师徒之情，送钱物接济，都被关先生婉言谢绝。然而在他人有难之时他却尽力资助。时人常称赞他“武德更胜于武功”。由于他身兼绥远省国术馆名誉教练，所以除每个星期天，平时一有空闲便到国术馆指导学生练武，并于此间常与吴桐、云连升、程全忠等教师交流武功，博采众家之长。归绥沦陷，日伪建立了伪政权后，关先生誓不为日本人效力，毅然辞掉建设厅公职，以做小本生意度日，继续传播国术。

解放后，党和政府号召挖掘祖国文化遗产。年逾花甲的关先生更为关心武术运动的发展，他勤勤恳恳地从事武术教学、精心培育桃李，深受人们的尊敬。由于他通晓各路拳种和器械，故被武协聘为裁判。一九五〇年他已着手武术经验总结，苦心研究近二十年，完成了五行连环拳要旨和形意拳桩功心法的整理，创编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鹿角拳、进步锤、八卦月牙戟和连环刀等套路。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尚未发表便在“文革”中遭

到毁弃。

“一日不练十日空，十日不练百日空，百日不练一场空”。这是关先生的口头禅，常用于教诲学生坚持不断地练功。正因为他自己谨守这一信条，坚持寅卯之交起身练功，所以得益匪浅，不仅功夫日深一日，而且常年体格健壮。他多年揣摩，自悟点穴法，融合于拳路中运用自如。一九五七年关先生虽年近古稀，仍是步伐矫健，精神矍铄，眼明耳聪，神采奕奕。他在新城区人民政府支持下，创办了武术锻炼站（西落凤街，关先生故居），把自己的心血全都倾注于武术的教育事业上。他对学生要求很严，除传武术更传武德。当时从师于先生的人，多为青少年。对这些朝气蓬勃好勇善斗的学生，先生是以武德治其性。在教武中很少强调技击内容，只讲武术强身的道理。然而在整個训练中，则以达到攻防技击，艺术表演和强健身体三者统一为目标，把基本功训练放在首位。从马步打捶、弓步打捶、赴步、站桩、揉腿、练腰和窜蹦跳跃等项目训练，手、眼、身法、步起，到整套拳技和器械中，每招每势无不寓意技击的内容，只是先生谨慎未予点破。今天许多学生仍坚持苦练，他们在实践中才领悟到其中奥妙，认识到基本功训练的重要。

关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了，他的学生们为了增强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正在开拓武术运动的新局面。塞上武术运动定将发扬光大。

塞上名“净”杨胜鹏

邓孝明

杨胜鹏同志是献艺于内蒙、河北、山西等地区，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内蒙群众所喜爱的并且至今仍健在的著名晋剧花脸（净）。

杨胜鹏同志1919年出生在河北省涿鹿县宝岱村一个雇农家庭里，父亲终年以扛长工为生，母亲是童养媳。一家五口，相依为命，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苦日子。茹苦岁月，又遭不幸，胜鹏七岁，父亲去世，子顶父债，全家被扫地出门。时逢大旱，无以为生，只好随母另投到一个名叫杨吉庆的艺人身边，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天灾人祸，迫使他含着热泪随继父进入了一个名叫黄德胜的娃娃科班，开始学艺。

他继父杨吉庆（艺名刀劈生）和教师吉先（艺名八百银）对他教育很严格。他在班中勤学苦练，除了正常的日功外，每晚还对着月亮影子盘身段。因为他的老师是满清时代京东（离北京四十余里）大吉利科班的学生，唱的是京梆子，身段表演都是京剧的程式，干净、大方。所以杨胜鹏同志的身段表演，从小就受他老师的直接影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开始只学演架子花脸，不能唱，主要攻身段，练基本功。学的念白是京剧白。后来他自己学了一些戏，又拜在名净赵克家（艺名马武黑）

名下学唱，在唱功上有了突出的进展。这时，道白改为蒲白。胜鹏十五岁开始登台演出。初露头角即为长辈艺人所赏识，尤以《凤鸣关》这出戏，更受好评，当时被誉为张家口“小马武黑”。

杨胜鹏同志带着初学到的几出戏，出科走向社会。开始随赵克家、崔德旺（艺名九岁红）一边演出，一边深造。后来加入了刘明山的戏班，受刘明山、刘玉山、刘宝山的直接传授，演出时和刘宝山、刘玉蝉配戏。所演《打金枝》、《明公断》、《鸿架山》、《忠保国》、《凤仪亭》等大本花脸戏，受到晋剧界的重视和好评。其间，还在天津、北京、大同等地辗转演出。在北京曾和牛桂英、郭凤英（艺名十一生）、马秋仙（艺名小果子）等同台演出。在大同与王治安（艺名凤凰旦）、平旺黑、苏玉兰等一起搭班。在与名艺人一同演出中，他专心致志地学习名艺人独特的唱做艺术。同时还登门拜访了许多艺术前辈和名流，使他受益很深。如京剧名净侯喜瑞老先生，在一次传授花脸表演艺术时，曾说：“花脸的身段要比小旦的还美”，对这句话，他心领神会，很有启发，对他后来继续下苦功夫，提高演技，鼓舞很大。这时，他住的是张保奎（艺名小吉先）的班子，常与李子建（艺名夺庆）配戏，合演《三下阴》、《绿判官》等戏。在李子建家与京剧名角裘盛戎、河北梆子名角李桂兰等相结识，经常趋往，虚心求教，这对他艺术水平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

回到张家口后，由于他的眼界宽了，加之不断的艺术实践，演出渐臻成熟。除了与刘宝山、刘玉蝉、崔德旺合作演出，还与筱桂桃、郭寿山（艺名金铃黑）、蔡有山、王正奎、张胜铃等名角同台演出。尤其是与李必兰（李子建徒弟、小旦，现在台湾）同台合演《杀官》、《英杰烈》，博得梨园行及广大群

众的赞许。

杨胜鹏同志在舞台艺术得到进一步提高的同时，对艺术理论也进行了不断的钻研。有一次李子建介绍新玉亭（晋剧名净、艺名小狮子黑、内蒙萨县人）的艺术表演时说：“新的骑马动作的要领是‘以步代马’，并有内蒙人骑马的生活基础”，并讲到“穿蟒要有穿软靠的身段，穿软靠要有穿蟒的身段”，身段要有棱角，即“站如钉、弯如弓、坐如钟”，这些指点，都使他逐步懂得了演戏要演人物，要有内心感，要深入体验生活的基本道理。

张家口解放，他参加张家口市戏曲二分会，参与戏曲改革工作，开始演出现代戏。排练的剧目中有《血泪仇》、《白毛女》等。他扮演《血泪仇》中的区委书记。后来，又在涿鹿县排演现代戏《新大报仇》（张黎导演），他演郭文早。在大同与筱桂桃合演现代戏《四劝》。在这些现代戏的演出中，他认真体验角色，对人物塑造有了更大的提高。

1950年胜鹏同志和他的师兄王治安一起来到内蒙。起初在呼市晋剧一团，他和王治安、住翠凤、苏玉兰、常艳春（艺名八岁红）等同台演出，受到呼市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到1954年，内蒙派来了戏改组，他和编导曾世先，李晨征等人密切合作，演出了不少经过加工整理，推陈出新的优秀剧目。在《秦香莲》一剧中，他扮演包拯，艺术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在全区戏曲会演中，得了演员头等奖，受到全区人民和领导的好评。这时，他在一些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对自己在科班学下的一些旧戏曲程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如花脸的旧唱法，很讲究用虎音和“炸音”，但“炸音”往往脱离人物，有时会因用了“炸音”而破坏人物形象的完美，所以把它废除了。

在吐字方面也做了改革，对过去旧唱腔常用的土字，改成以普通话来吐字。但字腹和字尾仍归到晋剧的韵上来，以字收音归韵，而且咬字特别有力而清晰，改掉了鼻音厚重，吐字浑浊的旧唱法，形成了他吐字铿锵有力，行腔粗犷奔放，“字如钉，腔如云”的演唱特点。这些唱腔，已灌唱片，在区内外广为流传，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吸收其他剧种之长，改进和丰富晋剧花脸唱腔的曲体，他曾排演了昆曲《锤嫁妹》。通过不断的吸收、融化，使他的艺术表演领域得到进一步开阔。

1962年，他随呼市晋剧总团赴山西演出，他演出《秦香莲》、《巴州》、《李逵》、《七堂会审》、《打渔杀家》等，受到山西同行的重视。山西文化局曾组织专场，观摩他的艺术表演。兄弟省区领导和同行对他的鼓励，使他更加虚心，更加热情地向兄弟省，特别是向晋剧发源地山西同行的学习。到西安演出期间，还虚心向蒲剧界名老艺人求教，向他们学习了《火焰驹》、《赵氏孤儿》等优秀剧目。在呼市多年来，还常和京剧艺术家李万春及李庆春谈论京剧和晋剧的各自特点，聆听他们对晋剧改革的意见。

1960年杨胜鹏同志随团赴包头参加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为工人演出时，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他感动地热泪盈眶，浑身是劲。之后，他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演出了大量的现代戏，热情地为各族人民服务，奉献宝贵的精神食粮。由于他热爱现代戏，且有青年时代在张家口演现代戏的良好基础，所以他演的许多现代戏，如《白毛女》、《夺印》、《同志你走错了路》、《红灯记》、《沙家浜》、《江姐》、《智取威虎山》、《巴林怒火》、《杜鹃山》等演得都很成功。他塑造的各种现代人物形象，鲜明、丰满、栩栩如

生。几十年来，他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总是勤勤恳恳，毫不以名角自居。他十分尊重剧作者、导演、音乐以及领导和群众各方面的意见。有一次演出《同志你走错了路》时，一位领导干部上后台，给他讲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关系，他听得十分认真，当场表示要继续努力，进一步了解历史实际，演好这个戏。当他在农村演出《夺印》一剧时，公社和大队的一些干部，曾和他半开玩笑地说：“老杨，你扮演的书记，架子太大了，我们可不象你那样盛气凌人呀！”虽是取笑的话，但却引起他的注意，使他感觉要演好现代戏，必须深入到现代生活中去，找寻新的表演形式，对戏剧的程式化的动作必须加以改造。演戏要有程式，但决不受程式的限制。究应如何改造？带着这个问题，他有意地深入到农村去观察体验基层干部的举止言谈、连家庭生活也细致入微地观察，并经常和他们交朋友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他演《江姐》中的兰洪顺也很成功，与康翠玲、任翠凤、亢金锐等人密切配合，创造了这个戏在内蒙演出场次的最高记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胜鹏同志在现代戏的长期演出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到晚年，他演出《杜鹃山》，表演逼真、人物性格突出，十分动人。特别是他和冬青同志合作，为适应雷刚这个特定人物性格的感情需要，对改花脸唱腔进行了一次突破性的改革。如“哭大江”一段唱腔，打破了行当界限，以花脸腔为基础，吸收了须生腔；以晋剧“滚白”、“流水”板的旋律做基础，吸收了“哭腔”，并把这个板腔的节奏予以规范，把原来的散板节奏变成了既自由又有节制的新的板腔。在发声上运用了假声具哭音与真声大嗓相间出现的新唱法，使这段腔唱得如泣如

诉，人物的思想感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收到了很高的戏剧效果。记得当时在呼市演出，当唱到“大江啊，大江啊”一句腔时，台下观众屏住呼吸，暗暗擦泪。包头的刘启焕和同来呼市的文艺界同志们看完后，热情地鼓励并赞扬了他的表演。他虽年过花甲，还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拼着老精神坚持演出。这种献身精神，使全团演职员都为之感动，同时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重。

在来到内蒙几十年的艺术生活中，在长期为内蒙人民服务中，他受到内蒙人民的哺育，形成了他的具有内蒙特色和人民性格特点的艺术风格，为各族人民所酷爱。由于他忠于人民艺术事业，所以受到党和人民的器重，被选为呼市政协委员。

1982年，胜鹏同志退居二线，到呼市戏曲学校担任艺术顾问，他十分关心戏曲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亲自施教，毫不保守。热爱党的文艺事业，决心把党给他的艺术，毫不保留地传给下一代，为党的文艺事业更加繁荣昌盛，贡献余热。

我的艺术生涯

韩世五

我于一九二六年出生在山西省繁峙县大营镇一个贫农家庭。七岁时随父来到口外。中学毕业后打过短工，种过地，做过小买卖。这期间我受尽了日本鬼子、汉奸的欺辱和地主老财的残酷压榨。家乡解放后，党把我这个受尽折磨的穷汉从苦海里拯救出来。我分到了土地、农具、粮食，过上了幸福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通过新旧社会的深刻对比，使我对新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旧社会劳动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交不完的苛捐杂税，不断地被抓壮丁，受不完的压榨蹂躏，这些惨痛的历史事实给我以后的艺术生活以极大的影响。

我从小就爱说爱唱，村里来什么戏我都一看再看。每逢过年过节闹红火，我就给人家背上鼓满街跑，感到美滋滋的十分高兴。有时跑好多里去看人家唱晋剧。我接触最多的还是数二人台了。记得那时有游八子、护心油、大老板、三老板、二姑娘、三点红（这都是他们的艺名）等二人台老艺人常在绥东一带演出。每当演出时，不论路途多远，是风天还是雨天，我都赶去观看，悄悄地背人家的唱词，比划人家的动作。回家后，走走站站的唱，时时比比划划。就这样我学会了许多当时流行

的小曲子。一九四五年二人台老艺人赵小柱收我为徒弟，从此开始了我的二人台艺术生涯，经常参加小班中的演出。演出过程中我对那些低级下流和黄色淫荡的词句动作进行了删改。在那时我就琢磨着二人台的改革，只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不多几年，在老艺人的指导下，我演了许多传统二人台戏。由于当时我的嗓子很好，群众便称我是“金嗓子”，所以我在家乡的十里八乡颇有声誉。

一九五一年我正式参加了集宁县文工队，任务是配合党的各项政治活动，进行宣传，如土地改革、镇反肃反、抗美援朝、取缔一贯道、三反五反等等。一九五四年文工队改为平地泉行政区歌剧团，一九五七年合并于呼市民间歌剧团。我先后担任过演员队副队长、戏剧队队长、编导室副主任等职务，也是主要演员，曾受名演员待遇，现称名老艺人。我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员、呼市剧协理事。

在三十多年的舞台实践中，我扮演了一百多个不同类型的角色。如《走西口》的太春，《打樱桃》的小生，《压糕面》的二小哥，《卖菜》的刘青，《卖碗》的王成，《卖布》的张良等。现代戏演的也比较多，如《刘巧儿》、《柳树井》、《张三赶脚》、《柯山红日》、《卧虎镇》、《豹子湾战斗》、《红灯记》、《法庭内外》、《救救她》。我还演了许多反面角色如《于无声处》中的何是非，《洪湖赤卫队》中的彭霸天，《卖毛驴》中的奸商，《五姑娘》中的杨金元等，还有古装戏《洞房装疯》中的丑公子，《梅玉配》中的苏旭等。我在这不同人物不同性格的众多角色中都力求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主要从刻划人物性格着手，这对我以后创作剧本起了不小的作用。我在写《卖碗》当中，塑造的几个不同的人物，

都是自己真实生活的体现。《卖碗》中的王成是那样的勤劳、勇敢、聪明机智，和那个尖滑刻薄、爱财好色的薛称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还在《卖菜》中塑造了活泼风趣、诙谐勤劳的刘青。我力求通过这些人物的刻画，揭露和鞭挞旧社会种种丑恶现象和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弊端。同时歌颂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勇敢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及劳动人民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在创作过程中，我适当地运用了二人台的语言特色，如串话、顺口溜、歇后语、快板诗等雅俗共赏的语汇。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能体现人物思想感情，从而使二人台具有独特的风格。

多年来，我创作改编了《卖菜》、《卖碗》、《金花的婚事》、《红梅》、《卖饺子》等剧，次第演出发表。其中《卖碗》、《卖菜》、《卖饺子》等一些剧目分别由内蒙电影制片厂、内蒙电台、电视台拍成了舞台艺术片，电视录象，灌制了唱片，录了音。这期间我演的《青山前哨》、《并非小事》由内蒙电视台录了象。《邻居》由中央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

我演过的《卖毛驴》获全区汇演优秀演员二等奖，《卖菜》获全区汇演优秀演员二等奖，《卖碗》获全区汇演优秀剧本创作一等奖、优秀演员奖，《卖饺子》获呼市优秀剧本创作奖，《最后决定》获演员奖。我还给《洞房装疯》、《走西口》、《打樱桃》、《压糕面》、《卖菜》、《卖碗》、《卖布》、《朝阳沟》、《两块六》做了导演工作。一九八三年创编了大型地方戏曲《苦水鸳鸯》、现代小戏《山乡亲》，参加呼市中青年汇演。

对于我的艺术风格，在一次呼市文联、文化局主办的二人台研究会上，有的同志说我是二人台艺术的三个流派之一。他们

对我的表演分别说成是：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生活化的表演，有的还说是体系化、性格化的表演，众说不一。总体来看还是性格化的表演比较合适。自己也对一生的表演作过研究。我认为既要保持二人台的传统风格和已经发展了的表演程式，也要吸收借鉴其他剧种的表演程式，力争寻求那些符合二人台剧种的唱、做、念，从而丰富二人台这个新兴的剧种。

在二人台唱腔的运用上，我是采取真假声混合演唱的方法，这就是二人台的风格之一。有的同志说用小嗓子唱，是因为过去没有女演员，而是男扮女装。用小嗓子唱是可以的，装男角就不能用小嗓子唱，这是对的。如果二人台的男角都象京剧中小生的唱法，那当然是不行的，但是用真假声配合的唱法又怎么样呢？如果说用真假声混合唱是男女同腔逼出来的，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更何况，也不尽然是这样，也有其自身形成的因素。二人台是民歌小调、爬山调、蒙古曲等组成的，蒙族民歌的特点是，男声多数是用真假声混合唱的，汉族的爬山调、烂席片、打樱桃等等，开始就不一定用伴奏，但他就是用真假声混和唱的。我小时候听老艺人讲，要想唱好，就必须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我便曲不离口，天天坚持练嗓子，我发音时避免波浪音的出现，声音要靠前，要圆润，自己感觉到舒服、不压、不挤即可。在我的艺术道路当中，就是采取了这样的唱法，得到了公众的承认，没有引起非议，并认为这才是二人台的味儿。在发声上，我还吸收了晋剧、京剧、秦腔等剧种的方法，也加了些“洋”发声，如：运气、胸腔共鸣的运用。但纯属唱新歌的未必能唱二人台，就是唱出来，观众也会说那不是二人台。

二人台的语言形式基本上是土语，但要规范，特别注意的

是咬字、吐字。例如，知、吃、诗、资、雌、思。类似散——扇、删——三、禅——餐、常——仓、丧——上、申——宗、商——桑、初——粗等很多都是应区分开来，否则对二人台的语言艺术有所损坏。我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力求使观众分清、听懂，便于接受。

在二人台表演方面我间接地向话剧、电影学习，吸收其适合于二人台的方式方法，并在许多剧目中做了大胆的尝试。比如我接到剧本后，先仔细分析剧本，弄清主题思想，理出人物的思想脉络和其他人物的相互关系。还到生活中寻找模特儿，这使我有效地把握了人物的特征，演起来才得心应手，随心所欲。我不喜欢那种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表演，更不愿把其他剧种不加改革的程式化东西吸收进来。应该有所选择地、有鉴别地吸收，博采众长，丰富二人台艺术。例如我曾经导演和演过的戏中推磨、箩面、蒸糕、推车、赶车、骑驴、担挑上下坡等一系列动作，都是无实物表演，这些都是生活的积累，表演起来，生动、自如、形象。这些是其他剧种程式化所表达不了的，更是代替不了的。这也是我在生活的基础上，加以高度的集中、提炼而成的，这是一个艰苦的艺术创造过程。这也要求平素对生活的观察、分析、潜心的研究，从而创造高超的艺术，给人民以美的享受。

我几十年的艺术成就都是在党的培养下取得的。是人民教育了我，党给我以教诲，这我是永生难忘的。

土默特蒙古族的婚姻仪式

伊锡尼玛

我们在谈土默特蒙古族的婚姻仪式问题之前，先得谈一下我所说的“土默特”的范围。这里所说的“土默特”并非单指现在的土默特左旗和土默特右旗的所辖地，而是指整个土默川而言的。一般说来土默川的范围大略是东至东山沟，西至黄河东岸，南至清水河一带的南山北麓，北至曾一度被人称为“萨并地”的召河。连大青山各条沟里，当地人称为“二架子”也包括在内。此文所谈的“土默特蒙古族的婚姻仪式”，就是只限于这个范围之内。因为，元朝失败后退居关外的“土默特”要比土默川大得多。

我亲眼见到的不止一次的土默特蒙古族的婚姻仪式，已经逐代改革成为汉、满、蒙、藏四体合璧的婚姻仪式了。这四种民族习惯性的婚姻遗迹，从举行仪式的开头到结尾掺和在一起。

说它有汉族的习惯，是因为它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确定婚否。另外，也要对命，就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再就是对属相看大婚合与不合，这就是按天干地支来推算。到了迎亲时要按上列两项情况再加上四面八方和二十八宿等等，择出黄道吉日，才能举行婚礼。说它有满族的习惯，是因为参加婚礼主要人员身穿长袍短挂，头戴缀有红纓的帽子，礼节上也是满族

礼拜的做法。说它有蒙古族的习惯，是因为娶亲时还是骑马射箭。尽管新娘主要是坐轿车，但在上车前总得骑上马走几步才上车。新娘到了婆家后，不拜天地而是按蒙族的习惯拜桌。说它有藏族的习惯，是总得请喇嘛念藏文经典。本来喇嘛教由西藏传入蒙古是明朝后期的事，以前蒙古族是不信佛教的。由此推断，我们有理由说它从满清进关以后，这种原是抢亲的仪式就逐渐有所改变，到后来就沿革成汉、满、蒙、藏四体合璧的仪式了。

下面我们就简略地谈一下这一仪式的由始到终的过程。

先是由媒人出面提亲。当然，首先得门当户对，不然的话是不成的。然后媒人把男女双方的年令和出生的年月日时以及属相等了解清楚，再看大相合与不合。这是按子丑寅卯等的十二地支，还得结合甲乙丙丁等十天干，经过测算如果大婚相合这就完成了第一步。另外，就是对命。所谓对命，就是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来看。如五行相生就行，如遇五行相克就不行。有的人还要看生辰八字等等。

以上这些条件具备了之后，就通过媒人说合，在男女双方父母的同意之下，就进行下小订。这个小订是同大定相对而言的，因为结婚之前还要下一次大定（订）。这一切都是由双方的父母包办，至于将要结成夫妻的青年男女都得听命于各自的父母，否则，就得负大逆不道败坏门风的罪名。所谓下小订，就是通过媒人，男方给女方送一瓶烧酒，再给新娘送点信物，有的给一对银制的手镯，有的给一对银制的耳环或戒指一类的东西，就算是订亲的仪式。待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时，还得下一次订，这次叫做下大订。所谓大订仍然是通过媒人，男方给女方送一瓶烧酒，外加煮成半熟的羊腿。同时还要进行

“搞彩礼”，所谓搞彩礼，就是出卖姑娘的讨价还价。将姑娘的身价言定后，那就必须在娶亲之前男方向女方交清，绝对不能拖欠。当把所定的彩礼钱交清之后，就请素有名望的能看懂玉匣记的识字人按照前面已经提到的什么天干、地支、五行、二十八宿、阴阳八卦择定黄道吉日，男方才能去女方迎亲。

以上这两段所述的内容，它有孔教的三从四德，也有道教的阴阳八卦色彩。是承袭了汉族的礼节。在迎亲吉日的前一天，女方要向男方送去陪嫁的箱柜，所谓箱柜，在农村中一般的是一只堂柜。随同送箱柜的车还要跟一位年纪四十开外的妇女。这位妇女用蒙语说，叫做“勃勒更”，译成汉语就是嫂子的意思。这位名叫勃勒更的妇女负有两种任务，一是照看柜内装有新娘的衣着首饰等物，二是等新娘初来乍到这人地生疏的婆家时，也好照顾新娘的起居饮食。不过在我亲眼见到的这个妇女不一定是新娘的嫂子了。在同一天，也就是迎亲吉日的前一天，男方的新郎和伴郎由一位能说会道、年纪较大的男人领上去到女方家里。人们称他“说匠”，蒙古叫他“克里木气”。同时还得给女方的父亲送来一只绵羊，叫做“碰门羊”。这只羊必须是羯羊。这时女方把将要出嫁的新娘用一张被子蒙着头坐在炕的一角。新娘的外侧坐着呈现扇形的团坐着三到四个年令小于新娘的姑娘，这些小姑娘也有个名字，叫做围昏晃的姑娘，这时新娘还得低声地哭泣着，以表示不忍离开亲人的苦脑。当然，也有真哭的，也有假哭的。总之，不哭是不行的，这也是一条规矩。另一面在同一个炕上大摆酒席招待新郎、伴郎和说匠。席罢，岳母送给新郎的礼物是一条腰带。还得举行一个系腰带的仪式，首先女方的嫂子要求伴郎用蒙语唱几首歌，接着女方的嫂子们给新郎系腰带，她们狠命地勒新

郎，直到新郎告饶为止。但这种恶作剧的礼节是极个别的，一般是系上就行了。第二天是正婚吉日，在天色不亮女方就摆满好酒席招待来宾，当然女方也要派出陪客的人，当酒过三巡后，蒙语叫做“克力木气”的说匠，要给女方的陪客者和女方的嫂子们斟上酒，这个仪式叫做“讨名字”，必须从女方的嫂子嘴里说出新娘的名字才行，别人说了还不算。有的嫂子立即告诉，有的还要故意刁难说匠不立即告诉他，这时候就看说匠的口才了，如能把在场人逗笑，嫂子就把新娘的名字告诉出来作为了事，不然的话“说匠”就得跪在地上等着。待到新娘上车后，新郎骑在马上从喜车前面向喜车后面无目标地空射一箭。新娘的喜车走到离男方的村庄一到二里的时候，男方派出两到三人带上一瓶酒和几只酒盅、一个煮成半熟的羊头，骑马赶到喜车前，先向送亲的人问好，然后下马，并做出将要给送亲者斟酒的样子。对方说几句客套话表示谢意，但并不喝酒。随后迎亲者把羊头从喜车右面扔到喜车的左面。然后跳上马去策马飞跑，送亲者追上来刁帽子。也有刁上的，也有刁不上的，不管怎样总得有这样一个过程，这也是规矩。

至于来往客人们的装束靴帽都是满族的打扮，对长辈的行礼也是满族的礼节。再就是新娘到了婆家后不是象汉族那样拜天地，而是拜皂。蒙族的习惯是西为上，拜皂时新郎跪在皂门前的右边，新娘跪在皂门前的左边。男方的左手和女方的右手伸在一个特制的小红袋子里，在这布袋上男方伸手的那面绣着一个太阳，女方那面绣着一个月亮。这是按汉族的一句老话叫做“阴阳和而雨泽降，夫妇和而家道昌”的说法学来的。当两位新人拜皂的同时，喇嘛在炕上正中央的桌子后面坐定念着藏文经典，叫做念洗脸经。据说是为了驱除那些妖魔和所有不

吉利的东西。与此同时，在另外的屋子里招待送亲来的贵宾们茶点。拜皂的时间不长，三、五分钟就完了。接着就大摆酒席招待一切参加婚礼的亲朋。晚上也要闹洞房，无非是给新妇出些难题，开个玩笑，逗个热闹就算了事。第二天是新妇认大小，由男方的嫂子领上新妇先给公婆和叔伯婶子大娘们叩头行礼，然后小于新妇辈数的侄儿男女们再给新妇请安行礼。第三天是新妇的母亲和几位女方的女长辈来婆家，一是认亲家，二是看望自己的姑娘，这一点，蒙语叫做“依勒格庆”。当男方热情招待过后，来客带着前日来的“勃勒更”辞别而归去。土默特新妇不象汉族那样第二天就回门，只是到半个月的时候，新妇要回娘家住半个月，这也有个名字叫“住半月”。等到半月完了归来后就由新妇变成旧妇了，开始操持家务，奉侍公婆。

以上，就是“土默特蒙古族的婚姻仪式”。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再加上手头没有参考的材料，我想错误的地方很多，仅供参考。

乌素图召宗教活动仪式

伊锡尼玛

关于乌素图召的宗教活动仪式，以各个寺院的始建顺序谈：

1. 法成广寿寺：每日的必修课是上午念七本护法神经，蒙语叫做“当浪达圪什德”。这七本经合起来很长，用最快的速度念也得四至五个小时才能念完。其动用的法器是小型的。因为是一个人念，只用小铙钹小鼓，再就是铜铃，蒙语叫做“哼嘿”；烧酒钵，蒙语叫做“塔德”；法水壶，蒙语叫做“本布”；梆浪鼓，蒙语叫做“登布捞”等各一个。这里先要说明一点，喇嘛的经文是藏文，在呼市地区的寺庙内，喇嘛们从开头学经就只读字音，而不解释内容。喇嘛们只知道什么佛前念什么经，并不深究其涵义。乌素图召也不例外，因为这已成为习惯。即便是略知大概也是传说。所以我这里略加解释地写出来，难免有不恰之处，只供读者参考。

这七本经的内容，先是请神。当念过七次请神经，把七位护法神都请到，并摆上宴席加以招待。首先拍铙钹搥鼓。就好象民间唱京剧，每一位扮武将的出场响一次乐器那样。待七位护法神将到齐，各就各位之后——当然，神的到来肉眼是看不见的。这时念经的喇嘛停止了铙钹和搥鼓。接着将插有孔雀翎的铜制壶的法水，以手持壶塞向空中点三次，再用左手拿铜铃

将无名指伸到酒钵里沾上酒弹出三次，接着将准备好的木盘里的小米捏一撮向空撒出三次，据说这就是为神摆设了先茶后酒，撒出去的小米是给神佛特设的珍馐美味。

然后，念经的喇嘛又重新擂鼓拍钹，高声朗诵经文。前面曾提到过，一直念四至五个小时才算结束。这长时间高声朗诵，据说是向七位护法神劝酒招待，乞求保佑全召喇嘛们生命财产的安全，还清镇压妖魔鬼怪，确保国泰民安。当把这七部经念完之后，念经的人把所有的法器按照原来放置的样子收拾好，依旧把殿门关好上锁，才算收场。本寺中午不念经，待到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再去点一盏灯，烧一炷香。到此，这一天的必修之课就算了事。

上面所谈的是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另外，每年三月十五至十七日念一次大经，是本寺的主佛经，蒙语叫做“公勒圪”。七月上旬至八月中旬举行一次七七四十九天的大型活动仪式。这四十九天所念的经名叫做“样勒”。这一次是各位佛祖、菩萨的经文。是为了超渡亡魂，普渡众生。从所念的经文看，有金刚经、“般若经”、“桑堆”、“德木气格”、观音心经等。还念很多的“莫黑塔德”、“依勒力”等。这一次活动仪式的花费很大，除了民间善男信女所行布施银两外，全召各寺都拿出一定的银两。每年举行时，六个寺院的喇嘛全部参加，有的是入经堂念经，有的是做后勤工作，再加上帮忙的和吃闲饭的，每天不下一百人。早上是面茶内加黄油或羊油，中午是大块牛肉宽面条。这四十九天的伙食，每顿必须有剩余。这剩余下的饭是给游魂饿鬼们吃的。

据传说，人死后还有肉眼看不见的灵魂，而这灵魂是有等级的，一般分为三类。

第一类，也就是第一等，是为封建时代颂扬的忠臣、良将、烈女、贞妇、孝子、贤孙、仁主、义仆等，以及虔诚敬神、焚香礼拜、化缘布施、修庙塑神的善男信女，这类亡魂，不进阴曹地府，而由阎君判官指定金童玉女，引过金桥，跨过银桥，送往西天。从此，他们就可以享受永远不生不灭的极乐生活。这也就是前辈人们说的“进了天堂”。

第二类，也就是第二等，他们生世时，多无功名富贵，奔波终日，勉强糊口度日，以“和为贵，忍为高”为信条，平平庸庸，了此一生。这类亡魂，都到阴曹地府，被押在黑暗的地狱里，接受审判，准备转生。

第三类，属于第三等的，就是那些贫无立锥之地，甚至沿街乞讨以度残生的，还有的人为官府豪强所压，敢于造反或进行抵抗，还有的人，在生活被迫下，告贷度日而无力偿付，类似这些亡魂，不仅不能上天堂，连入地狱也不准落脚，于是就成了天不留地不收的游魂。按说：当一个自由自在的游魂，可以漫游世界上的名山大川，不能说是坏事吧！遗憾的是还长着累赘的“胃”，经常空空如也，害得他们无心游山玩水，为饥饿而痛楚不已。这就是喇嘛称为游魂饿鬼的来历。

如此看来，第一类亡魂是不需要念经超渡的，因为他们已经到了极乐世界，无须喇嘛们再絮絮叨叨了。第二类正是需要念经超渡的。经过喇嘛们念过四十九天超渡经之后，便会感动各位菩萨、罗汉和神佛，大发慈悲之心，去到阴间，在阎王面前替这些亡魂们通融。阎王和判官们看在说情者的面子上，把那些蹲在地狱里的受难鬼放了出来，让他们去转世投胎。这些难鬼被释放之后，通过十道关卡等待发落。据传说，发落的方法也不相同，有的被分配到阳间的权贵家里转世投胎，这就是富家

的公子和千金，一生享受优裕的生活。有的被分配到阳间的小康人家里去转世投胎，一生能过温饱的生活。其余一部分生前欠债的穷鬼，或派到穷苦人家里去投胎，长大成人也得受苦，或派到牛马那里投胎，以便还偿前生的债务。这样分派之后，先给这些亡魂灌上迷魂汤——据说一喝上“迷魂汤”就把以往的一切都忘掉了。赶上大转轮，各自按分配好的地方投胎去。

至于第三类游魂饿鬼没有投胎的份。这些饿鬼们只好等待着四十九天念经期内，每天喇嘛们把吃剩的面茶和牛肉宽条面从本寺予先特制的、用石板砌得很平整的、院西南角上的水道里倒出去的时候，他们才能饱餐一顿。到四十九天散经之后，他们也自行散去，等待第二年的四十九天。那么，这游魂饿鬼游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人们都不知道了。

另外，本寺于腊月二十七日举行一天大型仪式。这次所念的经文跟平日每天念的“七本护法神经”一样，其不同之处，就是参加的人数多，大动鼓号，还要送“八令”，人们叫做“送鬼”。所送的“鬼”是用五至六斤莜面捏成的，身体部分呈三角锥形，顶端捏一个干骷髅的头。大约下午三点钟左右，喇嘛们大动法器，也就是大吹大擂地把这个鬼送到预定的地点，扔进烈焰腾腾的火堆里去就算完成了这件功德事。事实上“鬼”是烧不掉的，早被吃“鬼”的人，即村里的穷人用予备好的挠钩搭出来提上回去了。

2. 庆缘寺：作为本召的主寺的庆缘寺，每年的宗教活动仪式，要比法成广寿寺的次数略多一些。本寺是一个两进院落的大寺。前院是大雄宝殿所在之处，后院是本召活佛的府院。

先谈活佛府的念经仪式。活佛府每天早晚一炉香外，中午要念一次“五位护法神”——蒙语叫做“塔本哈”——经。这里

的护法神经也叫做“萨勒考”。一般是一个人念，念时右手捣鼓，左手拍钹，有时配一个小喇嘛捣鼓。其内容及过程大致和法成广寿寺差不多，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少了两位护法神，二是这五位护法神将，只负责保卫本寺的活佛。看来他们是低于活佛的，是活佛手下的卫队。他们有责任保护活佛的安全和尊严。这次经也是喇嘛们每日的必修之课。

另外，活佛府在农历大年三十日晚上，举行一次大型的念经活动。据说，这夜的念经是为了迎接腊月二十三日去西天古佛那里汇报情况归来的众神和菩萨以及护法神将的。这样做是为了请他们在每年一次的汇报情况时，不要说喇嘛们的坏话——要“上天言好事”。为此，喇嘛们大动法器，大吹大擂地几乎念一整夜，一股脑儿把所有的神佛菩萨都迎接回来，并给他们摆上丰盛的宴席。这里所说的丰盛的宴席是和前面提到的一样：扬出法水，弹出烧酒，扬出小米，然后，喇嘛们放开嗓门儿高声朗诵着藏文经典，其内容不外是赞美各神佛菩萨的词语待把经文念完时，各位神佛和菩萨们也已酒足饭饱，各归本位，再蹲上一年待到腊月二十三日再回西天走一遭，向佛祖汇报这一年的所见所闻。

这次迎神中，单有一位神还没有迎回来，那就是财神。正因为他是财神，喇嘛们于春节第二天特地给他另设一席，也就是正月初二的早上。其过程也是大吹大擂，不过经文只是一本财神经。招待的方法大致和前面的相同。这是活佛府的每年必不可少的念经活动。

第二次大型念经仪式是在前院的大雄宝殿内举行。时间是正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全召的喇嘛们都得参加，所念的经文是菩萨经和九本护法神经，蒙语叫做“依顺达圪什德”。于十二日下午开经和十三日一整天念的是菩萨经，如白伞经、观音心

经、般若心经等。这些经不外是给死去的亡魂超渡，给在世的活人消灾免难。在十三日的夜间念九本护法神经，几乎要念一整夜。十四日上午送“八令”，这跟前面提到的送鬼经是一样的。下午就热闹了。要举行跳神大会，蒙语叫做跳“塔木”，一般人把它叫做跳鬼。总之，我看是一种藏民古代的一种图腾式的跳午会。这一天，附近村庄的居民们来赶会的很多，真可谓是人山人海。午场就在本寺大雄宝殿前的院内，参加跳午的喇嘛们穿上为跳午特制的衣服，戴上面具，伴随着有节奏的鼓号声，跳起了那图腾式的午蹈。大约跳三个小时散场。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五日，是“曼达尔”佛转召一周的出游。这一天前来观赏的人也不少于前天。其过程，大约上午十点钟开始。先把“曼达尔”佛的塑像从庙里请出来抬放到正门前准备好的辇上。这里所说的“辇”，样子跟过去那花轱辘车差不多，不同的地方是把车轴和两个轱辘安在车子的后尾上，据说，这种“辇”要比一般的车稳当得多。不然的话，绕庙走一周，道路崎岖不平，那泥菩萨难以完整地再回到庙内。当把佛象请放到辇上时，同时上辇的两个青年喇嘛，其一是护着佛身，另一个是给佛撑着黄罗伞。于是，村民们抢着拉辇。当然蒙民居多数，也有汉族参加。据说，拉了辇的人一年里无灾无病不算，还有添财进宝的希望。就这样转召一周之后，再把佛象请进原供的庙内。喇嘛们进入大雄宝殿念一阵子安神经，然后把佛前的供品各分一份带回家去。到此为止，庆缘寺在正月里的活动仪式便告结束。

本寺于九月中旬举行一次大型活动仪式。时间是三天，全召的大小喇嘛都参加。第一天的下午和第二天的上午念的是白伞经和几部短小的菩萨经。在第二天的下午念的是“干珠尔”

和“丹珠尔”两部很大很长的经典。这两部大型经典，要是一字一句地念的话，至少得念个半年六月的，那为什么在这里半天就能念完呢？喇嘛们对这两部经有个简便的方法，其方法与其说念，不如说是翻腾一次。把分成一百多本，用夹板夹着的宽而厚的经文，每人分到几本，打开大略地翻腾一过，重新夹起，并捆扎好，再照旧放回原来的经架上。以这样的速度也得两至三个小时才完毕。奇怪的一点是，这些里边用四至五层绸缎包袱包着，又用夹板夹着的经文，包扎时也不上什么防虫药物，只是一年翻一次，概未发现虫蛀或鼠咬的痕迹。关于这一点，我曾向前人打听过，他们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只推说是神佛的保佑。据我的推测这个谜是在夹经木板上。很可能这木板是樟木一类的木料制成的。遗憾的是都被人们当劈柴烧掉，现在一块也不存在了。书归正传，第三天念的是九本护法神经，当然是大动法器地大吹大擂，就是不送“八令”。这次大经同样是祈祷神佛普渡众生和国泰民安。再就是超渡亡魂。

那么，喇嘛们有无自身的祈求呢？是有的。那些成年的懂事的喇嘛们各按自己的所好也在默祷着，只是不说出来。据说，只要虔诚地默祷，菩萨就会理解各人的需求。这就叫做“心到神知”。至于那些只有八、九、十来岁的小喇嘛们是一无所求的，在经堂里念经时他们觉得很热闹，在佛堂里，只要师长们不在场，便指手画脚学着塑象的样子，寻开心，找乐趣，藉以自娱。

3、长寿寺：平常每日早晚念菩萨经。早上是“夹麻”，晚上是“丹力克”。中午念的经叫“萨勒考”，也是护法神经。有时还念长寿经。另外，就是每月十九日念的护法神经七本，人数只限于本寺的喇嘛。念经时，也大吹大擂地动用各种

大型法器。每年腊月十九日念一次内容跟每月十九日相同的经，就是比前者要隆重一些，也要送“八令”。

4、法禧寺：本寺的活动仪式，比前面几个寺院的要多一些。按时间的顺序，平常每天早上念“夹萨”，晚上念“丹勒克，”都是念给菩萨的经。中午念“萨勒考”，是念给护法神的经。

每年正月初二至初四念三天大经，前两天除了念前面提到的各位菩萨经，还加念一部药王经。第三天，也就是初四念的七本护法神经。举行的方式跟前几个寺院相同，也要大吹大擂地送一次“八令”，当然，所送的也是用袂面捏成的所谓“鬼”。

四月上旬念一次大经，大致跟正月里念的差不多。其不同之处是增添了“干珠尔”和“丹珠尔”两部长篇幅的经典。这一次最后一天也是念七本护法神经，但不送“八令”。

四月中旬举行一次为时九天的“苦修经”，用蒙语说，叫它为“努乃”。这场经人数不多，有时三人，有时五人都可以。在这九天念的是素经，佛前的供品也是素的。念经的喇嘛们每隔一天不吃不喝不说话。九天内就有四天不吃不喝不说话。这场经不动大法卷，只是摇铃、洒圣水、弹酒和扬几撮小米。在这九天内喇嘛们不能吃肉以及其他荤食。据说，也是为了超渡亡魂做好事。

七月中旬也是举行一次为时九天的念经活动。这次，参加人数是九人至十二人。经名叫做“塔勒布”，也是素经，不吃荤。其内容也是各位菩萨经，目的，也是为了普渡众生，超渡亡魂。这里所说的“普渡众生”，并非单指人类，凡是有生命的动物都包括在内，连生命最短促的蜉蝣动物也在内。

再就是七月下旬举行一次大型念经活动。这次念经大会跟

四月间的完全相同。因而从略，不加赘述了。

还有在十月间，从二十五日开经至二十九日结束，为时五天的“达勒德圪”，一般人叫它“杀鬼”经。事实也正是这样，参加念经的是七个喇嘛，每天晚上要杀一个用莜面捏成的“鬼”。每当傍晚捏鬼的喇嘛，把一个身长大约七寸长的“鬼”放在一个大木盘里，捧着放到念经喇嘛第一“温热德”——第一经头——面前，当时这个场面气氛十分紧张，鼓、镲也敲得很急。吹的是用真正人腿胫骨做成的喇叭，听起来阴森森好象哭泣的声声。当此时，第一经头用铜特制的杀鬼刀，把盘里的仰面躺着的莜面捏成的“鬼”横七竖八剁个稀烂，然后由捏鬼喇嘛端着扔到寺门外面。最后的一天是送鬼，念的是护法神将的经，这次要送三个鬼。送的方法跟前面送鬼的作法是相同的，其目的，是要把那些不利于人的妖魔鬼怪一揽子送走，免得它们捣乱。

另外，本寺每月初八日要念一次药王经，用蒙语说叫做“阿德气”。据说，此经的作用是给人消灾免难，首先是喇嘛们的健康和长寿。法禧寺的念经仪式到此为止。

5、罗汉寺：这个寺内不举行念经仪式。只是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开放。为时虽仅两天，场面却很热闹。尤其是老太婆和小媳妇们，对这个寺的罗汉很虔诚，他们带着特意献给罗汉的供品，如神香、黄表，还有馒头或是京点心。她们虔诚地磕着头祷告着，目的是求儿求女。老太婆，是为了早一天抱上孙子，小媳妇是为了早日生出一个白胖的小宝宝。为什么这些善男信女们要来罗汉庙求儿求女呢，只因为十八罗汉里有一位名叫“大肚罗汉”。而在这位光着头皮、敞开襟露着大得出奇的肚子的罗汉周围有一群白胖的顽皮的小男孩。他们有的爬在罗

汉的膝盖上，有的爬在罗汉的手臂上，有的骑在罗汉的肩头上用一根棍儿捅罗汉的耳朵。为此，惹得罗汉仰面大笑，把两只眼睛都笑成两条缝了。看了这种情景，谁也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原来敬香的人就是为求罗汉身旁的孩子投胎到她家中去。于是向神象叩头之后，从衣兜里把本预备的“栓儿”——用红线串上几个铜钱，套在她们最喜欢的小孩子的脖根上。当然，神前所供的食品都进了香火僧人的食橱里了。

6、药王寺：药王寺的念经活动很少，只在每年腊月二十三日念一次送神经，正月初二念一次迎接财神的经。平时，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念经的。

以上就是乌素图召六个寺院每年所举行的宗教活动仪式的大致情况。有些没有谈及的活动，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就停止了。这里谈到的是一直到解放前夕的活动。这些活动解放后也都停止了。

另外，因为我对藏文不通，在写的当中虽说向师兄弟们探讨过，但错误的地方仍必很多，希望指正。

归绥市的基督教

薛宏道

解放前，归绥市的基督教，有七个派别，各有会名，其活动情况各有特点。现逐一概述如下：

（一）内地会

内地会是美国的一个基督教派，传到中国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活动的范围，起初在沿海一带，庚子年(1900年)后，深入到内地。建教堂，传教义，办学校、开医院，以收买人心，扩大影响。在他们中间，有神的用人，也有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借传教为名在我国国土上作见不得天日的坏事，引起中国人民的仇恨。因此中国人把他们所传的道，叫“洋教”，把他们所住的地方叫“洋堂”。外国的传教士一百多年以来一直控制着教权，统治着教堂，奴化中国信徒，使中国的教会处在“洋教”的控制之下，甚至连中国人自办的教会，也要受他们的辖制和歧视。为此每个热爱祖国热爱教会的基督徒都对他们持着反抗的态度。

内地会传入呼市之前，美国的宣道会最早传入。时间在光绪二十六年，他们中有些死于庚子年间义和拳运动。其遗体葬于呼市郊外内地会墓地内。后来瑞典的协同会进入呼市继续传道。今天的呼市旧城通顺街教堂，即系民国十四年瑞典人麦

礼直牧师手所建。协同会本是瑞典的差会，由于该会无权在中国传道，因而借英国的内地会之名传入中国。所以通顺街教会在名义上称作内地会，实际它是瑞典的协同会。

内地会在呼市先后共有信徒千余人，一九一三年间瑞典国瑞闻生牧师在归化城时，为了福音工作的开展，设立了西医诊所兼助产业务。其妻德瑞生为医师，其妹瑞教师为助产士。对穷人免费治病、接产，受到当时社会上的赞誉。至一九一七年间牧师被调至包头，其诊所随告结束。

内地会在通顺街建教堂之后，又在旧城县署街、新城西街各建教堂一处，均属旧城通顺街内地会。另外呼市郊区白塔、太平庄，也有他们的教堂。他们对外传福音，不仅在城市大街上并且还到农村，支搭帐棚，广为传播。他们的传道人，皆系雇佣制。教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那些外国人，往往独断专行，引起中国教牧的不满。有的辞职另立门户，有的弃教职另谋他业。兼之他们的一些教规制度，不符合圣经原则，传道工作渐渐冷落下来。这些外国人有个共同特点，即骄傲自大，目无中国人，又不联系信徒群众，他们和信徒中间，隔有一条鸿沟。由于中国的教牧多次抗议，他们才把教权转移到中国教牧人员手中，但并不彻底转移，还有些恋恋不舍，藕断丝连。中国的教牧人员为了教会的前途，为了信徒属灵的生活，忍气吞声地迁就他们。

临解放前，通顺街教堂系瑞牧师负责（瑞典人）中国为贾义牧师负责。县署街教堂系义牧师（瑞典人）夫妇负责，中国为韩桂先生负责。新城西街教堂系林牧师负责（瑞典人）中国为王登云牧师负责。

在旧中国要彻底实现中国教会自治是不可能的，这是旧中

国的国际地位所决定的。同时外国人借着他们在中国的特权，也决不肯放弃对中国教会的辖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督教才能为中国人自己所办。

（二）神召会

呼市神召会原系李金彪牧师所办。李于一九二一年间，由大同来到归绥，以纺毛线为生，开始办立此会。

李金彪中年时期于大同在由美国人兰夫南牧师创办的信义会，受洗信耶稣归入基督。李金彪在信义会学道三年后，开始了传道的活动。此人善武术，从小学得一身好武艺，练成一身过硬工夫。他壮年时期看不惯恃强凌弱的霸道行径，尤其对富家豪门子弟的横暴行为，更为厌恶。曾集结了十弟兄在大青山安寨，当时社会上称他们为大青山“十虎弟兄”。他们劫富济贫，惩办贪赃枉法的淫官和当地土豪劣绅，因而遭到官府多次缉拿，一度被捕。出狱后参加了当时的革命军，在闫锡山部充当侦探队长。由于目睹社会上许多不平之事，愤而弃甲归田。从此过上了平民的生活。当时大同的镇守使张汉杰曾一再请他从戎，均遭拒绝。他说：“穷不过讨吃，死不过断气，高官厚禄，动摇不了我厌世的心情”。就在这个时期，他毅然决然地信仰了耶稣，且步入了传道之门，成为当时平绥路上一位有声望的首创中国神召会的牧师。这就是绥远省神召会的发源。绥远省神召会的建成，为中国人在绥远自办教会创立了先声。

中国人自办教会，不受外国人的控制与束缚，为中国人所乐为。但却遭到了外国洋人的造谣诽谤、压制逼迫、危胁讥讽。而这些外来的干扰，都未能阻止他们对福音的传播，终于在绥远很多地方建成了中国人自办的基督的教会——神召会。

神召会建立后，发展很快，在原绥远地区发展到四千多人。信徒大部份是小手工业者，如呼市的赵记工厂、包头的八福工厂及其它小手工业作坊中的手工业者，很多参加了神召会。尤其是毛毛匠参加的人数更多，所以神召会也有毛毛匠教会之称。

神召会分布在原绥远省的九个地区。即呼市、包头、丰镇、陶林、莎县的黑马板、五原、百川堡、陕坝、临河等地。

呼市的神召会成立三年即有了大的起色，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在旧城上栅子街租赁了一处连接两个房院的地方，共有三十余间房子。其中抽上十间，是礼拜堂，为信徒礼拜大聚会等活动的场所。

神召会传道人完全义务职，笃行信心生活，他们的口号是：“不怕穷、不怕苦、不怕死”。这个信念是他们的思想主导，越是困难越百折不挠地为传播耶稣的福音而效力。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时候，连锅也揭不开。有时水沸无米，只能饮水充饥。冬天无御寒衣物，夜宿零下八、九度以上冷屋里，凌晨起床时，鼻涕冻成筷子般粗的冰棍。但他们却以此为乐。艰苦生活更激发起他们传播福音的力量。他们对神异常虔诚，几乎每次晨更祷告，皆歔歔不已而与神交通。因而人们对神召会也称为流泪的教会。

神召会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迅速发展并得以巩固，李金彪是有功绩的。李金彪后半生的精力，全部用于耶稣十字架福音上。四十岁开始信仰耶稣，在美办的山西大同信义会学道三年后，被立为中国牧师。他一生无儿无女，孤苦伶仃，房无一间，地无一望，不图名不为利。他非常轻视世界万事，以耶稣为至宝。他常言“活为耶稣活，死为耶稣死，虽在饥寒交迫极

度贫困的情况下也要传播福音，为宣传耶稣救人灵魂，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表现了他作福音仆人的决心。他还常说：“自己本是个楞小子，罪恶深重，然而还蒙怜悯，并作了耶稣福音的使者。自当竭力图报，以赎前愆”。他从未进过学校的门，是一个无文化的白丁。信主时已四十岁，为传播福音，他刻苦自学，后来全部《圣经》皆熟读如流，并能讲出高等神学生也讲不出的奥秘的道来。他的性格刚直不阿，态度尤为严肃。他口中从不出污秽的语言，说话很有分寸。他常言，一个基督徒必须致死肉体内的旧造，才能活出新生的样子来，才能荣神益人。他凡事都作信徒的榜样，以自己的言行，证明那是一位真活神。由于他无保留地献身于耶稣事业，得到了信徒们的信赖，从而促进了教会的发展。

不过李金彪在后来，也办过错事，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绥包沦陷。神召会传福音的工作，由于鬼子的监督刁难及压制，受到了限制。在此期间李金彪牧师出访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在上海基督教徒聚会处，受到倪析声、李常受的热情接待，倪、李还竭力表示愿与他在基督的真道上，同心合力，奔走灵程，共同开发西北福音的工作。李金彪听信了倪等的说辞。以后又到山东烟台等地住了一个时期。回到呼市后，大讲聚会处的事绩，要变神召会为基督徒聚会处。由于当时信徒的极力反抗，未成事实。为时不久，上海基督徒聚会处派遣恋腓力来归绥活动，李金彪热情相待，以贵宾礼遇。恋腓力借助李的声誉，在绥远地区大肆活动，造成绥远各地教会分裂的局面。继而山东烟台聚会处向绥远移民，首批先到包头。神召会予以接待从优安排。后来移民越来越多，包头神召会贾子丰牧师等，公开提出，反对给予安排。由此聚会处与神召会发生了不可调

和的矛盾。聚会处也不再打神召会的旗号而用自己的名义，另立门户，进行活动。倪析声提出：“二年打下全国”的口号，妄图建立所谓教皇式的统治。倪的野心遭到众教会的抨击。李金彪这时才与聚会处疏远了。

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后，在沦陷区的教会，皆转危为安，开始有了起色。归绥的神召会信徒，为了庆祝国土光复，捐资在呼市旧城东马道巷新建了教堂。在新城五区后巷改建了灵修院。神的事业，日趋兴旺，信的人也陆续增加，到解放前呼市信徒发展到五百余人。

神召会的经费来源，主要靠信徒乐捐和信徒们拿出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作奉献，与外国人不发生任何关系，因而是当时名符其实的中国教会。这是神召会引以自豪的特点。

那么神召会和外国人在经济上是否毫无关系呢？也不是。我曾记的一九四七年间，一位美国传教师史以礼（女）又来我国作传道活动。他原是大同信义会的一位女教师（信义会系李金彪的母会），因病离开中国已二十余年。这次来华，得知李金彪所办神召会的实况，特来呼市看望。他们经过密切的接触深谈，李金彪同意史以礼投资用以扩充神召会在新城的灵修院。这样神召会和外国在经济上就有了关系。这时正是全国解放前夕，史以礼离开中国避居香港，窥视大陆。一九五〇年史又从国外给李金彪汇来一笔款，折合当时银洋约五百元，经过呼市北耶稣堂韩桂的手，交给了李金彪。同时还因史曾与李金彪议妥邀请薛博五弟兄赴美国三年，汇款折银洋二百元给薛博五，也经韩桂手转交本人。史以礼既汇款，又邀人，其目的是图谋改变神召会的自办性质而为美控制的中国教会，若非全国解放，神召会也将沦为美国人所操纵的附属物了。

全国解放后，神召会为中国教会彻底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积极奔走，不遗余力。当时基督教内部虽出现过一股反“三自”的逆流，而李金彪等神召会领导人，始终站在与这股逆流做斗争的前线，为“三自”革新奔波效力。他的爱国行为，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呼市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成立后，李金彪被选为革新委员会付主任委员，同时还聘为绥远省政协常务委员。

一九五七年李金彪七十四岁时，因患食道癌逝世，葬于神召会乌素图村的墓地内。他临终前，将家中所有财物，全部献给神召会，并立约为证。像这样作基督仆人的，在中国教会史上，诚属罕见。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由于他在教会中有崇高的威信，许多信徒，把他当作自己老人一样的敬重。葬时约有三百余人参加葬礼，仪式极为隆重，正象俗话所说的那样“和尚无儿孝子多”。

李金彪为中国人自办教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信徒们至今还在怀念他。

（三）聚会处

呼市基督徒聚会处成立于一九四四年抗日末期。成立之前上海聚会处的头子倪析声派恋腓力来绥探视。恋腓力到呼市后，由李金彪带领先在神召会所属范围内活动，先后到呼市、包头、丰镇和莎县的黑马板等地讲道，查经、灵里交通等为时数月之久。由于李金彪的全力支持，聚会处在绥远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李金彪还曾表示愿变神召会为聚会处。正在酝酿转变的关键时刻，包头神召会提出了严重抗议，才阻止了这场恶梦。

恋腓力这一时期的活动，目的在于并吞神召会，建立他们

所谓的地方教会。这是聚会处在全国各地使用的阴谋手段。他们渗入到哪里，就从那里的教会中拉拢有声望、有权势、有财富的人和知识分子，以瓦解其他教会，壮大自己的教会。所以全国教会舆论，对他们有“偷羊”之称。恋腓力在呼市，也使用这一手段，从各教会里拉出一些受蒙蔽的信徒，成立了呼市的基督徒聚会处。并且向包头、河套地区发展。为了不让聚会处并吞其它教会的阴谋得逞，呼市地区教会联合别的教派共二十余人，组成传道团向包头、河套地区进发，所到之处，以新旧约的经典为依据，反驳他们的谬论，从而安定了当地的教会，使他们并吞其他教会的活动，有了收敛。但恋腓力并未死心，继续违反圣经原理，向其他教会进攻。由于他们并吞其他教会的阴谋，已被众教会所识透，大家对他们提高了警惕，所以他们瓦解其他教会的野心，未能实现，聚会处的组织也未得到大的发展。

聚会处的大头子倪析声扬言，要在一至二年内，打下全中国。他们积极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向全国进攻，企图建立其教皇式的统治，统一全国教会。这一妄想遭到全国教会的抵制。以我们呼市为例，七个教派中，除聚会处本身外，六个教派都和聚会处不合。一致认为聚会处，打着消灭宗派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宗派中的宗派勾当，为他主子英国弟兄在中国打天下，出力效劳，帮助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实现殖民化，这就是聚会处的实质。

聚会处为了扩大教权，巩固宗教统治，李常受与倪析声在上海还发动“献以散交出来运动”。说什么“今天若不交出来给神用，待共产党来了就得交给共产党拿去分掉”。他们用这种反共危言，煽动信徒倾家荡产地奉献财物，交给倪、李二人支配

使用。这样不但煽起了信徒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情绪，还诈骗到大量钱财。解放前夕，李逃往台湾时，将所有钱财全部带走，供其挥霍。呼市聚会处也有类似情况，他们在一次献以撒的大聚会上，煽动信徒大力奉献财物。有的人奉献了房院，有的奉献了金银财宝，有的贡献了养老积存，有的甚至罄其所有全部奉献，以表示对主的虔诚。倪李这种手段，在中国基督教史上是罕见的。信徒奉献来的大批财物并没有用到主教会的身上，而是供教会的统治者作了策划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金。倪李曾去福州参加古瓚会议，密谋解放后的反革命活动。

当时全国聚会处个别头目，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解放前夕，聚会处的二头目李常受逃到台湾策划解放后破坏大陆教会的活动。这种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至今还在向大陆渗透。现在我国出现的“呼喊派”就是李常受操纵的反大陆教会的工具。这就说明了那里伸进李常受的手，那里教会就不得安宁，对这一事实，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从李常受过去和现在的表现来看，他在政治上一贯反动，在信仰上已从肆意曲解圣经，发展到散布一整套异端邪说，他虽然是一个利用基督和教会的名义，毒害信徒，捣乱教会，破坏社会秩序，敌对新中国的害国害教的败类。李常受在美国的异端派，已经走向没落，因此近几年来他竟异想天开，妄图通过渗透活动，重返中国大陆，把新中国一些基督教徒诱入他的异端派，以壮大声势，来捣乱中国基督教，捣乱新中国。这是我们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坚决不能允许的。

解放后，聚会处头子倪析声，因反革命活动，被捕入狱。聚会处广大信徒，目睹倪析声由腐化堕落，荒淫无耻，声誉败坏，人格扫地，品质恶劣，又进而反对革命，认清他已经不是教会

里的领袖，而是窃据上海生化制药厂总经理位置，违法乱纪并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因此人民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逮捕法办了罪大恶极的倪析声，全国基督教徒对人民政府的这一正确行动无不积极拥护。并且纷纷脱离了聚会处，回到爱国爱教的行列中来。后来这个罪恶累累的倪析声终因死不悔改，病死狱中，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四) 自立会

自立会于一九二九年成立。当时的创办人是范海牧师，后由乔林牧师继承。这个教会的信徒，大部份是城市平民。该教会的特点，重视圣灵工作，所以有跳灵舞之称。另外他们有一种“唱道”习惯，即讲道时以唱代说，为其他教会所未有。该教在归绥的信徒最多时达百余人。他们也很重视农村的工作，所以在郊区也发展了許多人。虽然他们聚会时的景况与别的教会不同，被认为有些混乱。而他们却认为是过好了他们的属灵生活。由于他们对圣经的知识浅薄，道路走的偏重于圣灵充满的一方，搞什么异梦异象，送病赶鬼等活动。

自立会与外国人没有交往，没有经济上的关系。由于笔者曾参加过他们的敬拜，觉的有自治自传自养的样子。自立会曾经有过一些歪风邪气，如跳灵午中结灵妇的活动，还有一种男女拥抱医病的丑行。不过这些伤风败俗的行为是极个别的，只是在他们教会的中期出现过，以后便消失了。

解放后他们逐步进入正轨，与呼市其他教会走向合一的道路。在三自革新运动中表现的很好。

(五) 安息日会

安息日会（全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在美国。他们认为创世记二章一至三节所说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之工完成后，为人类建立的第一个制度，要人类守安息日（星期六）为圣日。并要求信徒全面遵守十条诫命。这是他们和别的教会的主要区别，也是他们的特点。他们坚持旧约观点，奉行不吃猪肉等规条。

安息日会大约于本世纪初传入我国。教牧人员实行工资制，不像其他中国教会有的教牧人员过信心生活（没固定工资）。因此在传道工作上，听凭上级调动，不像其他的教会凭灵感行动，这是安息日会的一条纪律。他们在我国分布的范围很广，尤其在城市，大多有他们的分会。在证道方面，重视圣经预言，强调信徒守安息日。经费也比较充足，在设立教会之处，多附办学校，个别也有办医院的，当然这也是文化侵略的另一种手段。

呼市安息日会创建于一九三三年夏初。后来华北分会决定撤销呼市这个点，从此安息日会停止了聚会礼拜的活动。他们的信徒约五、六十人，办有一处小学。一九五一年根据国家的教育政策，教会小学停办，学生都转入公办小学读书了。

安息日会在呼市没有什么起色，传福音的工作，也很平淡。所办小学，学生只有二十余人，现在呼市信徒不超过十人，都在合一的教会参加礼拜。

安息日会的组织是很严密的，因此他们在人事上经常有调动。负责的教牧人员变更情况如下：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于存寿。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王维杰。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张福恩。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宿耀堂。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高福堂。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王德俊。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王维杰。

(六) 救世军

救世军是一九二六年传入呼市的。他们的组织形式完全模仿军队，分将、校、尉三等九级。传道人均称作军官，身穿救世军人服，很有气魄，所以别的教会称他们为世俗派。他们很注重对外传福音。他们备有洋鼓、洋号、手鼓、锣钹等各种乐器，传道时鼓乐齐鸣，很能吸引人，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更感兴趣。他们只是形式上热闹一阵，真心归入基督的人为数极微。抗日时期，由于经费接济不上逐渐消沉下来，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美绝裂，经费断绝，救世军便烟消云散了，仅有一个姓祖的军官，看守门户。日本鬼子投降后，他也没有与上级接上关系，所以信徒均各自参加到其他教会中去了。

救世军总部设在美国，中国各大都市大多有他们的组织，规模不小，声势非凡，起初在中国的工作很有起色，亦很迷人。抗日战争后，则销声隐迹了。

(七) 蒙疆教团

蒙疆教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是沦陷区内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成立的。当时的负责人是朱一清牧师。这个教会成立的目的是，主要是拢络中国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以华制华的阴谋效

劳，因而带有帝国主义色彩。虽然这个教会从现象上看，信徒不受什么限制，但别的教会的信徒对他们多有疑惧，不敢参加他们的礼拜和聚会。即或有个别信徒偶而去一次，但以后有所警戒也作罢了。他们教会的信徒很少，礼拜天去的顶多二十人左右，很是冷落。有时别的教会的信徒路过他们教会门口，看到门首的会牌不由得胆战心惊，越门而过。这个教会，总使其他教会感到有一种压力。尽管这个教会没有过不法行为，或强暴行径，但别的教会对他们时刻警惕，以防患未然。总之这个教会成立后，给各教派造成了精神上的压力，经常提心吊胆预防突然灾难。

这个教会兼负另一种任务，是联络各教派的首脑，进行合作。但各教派的首脑都抱应付态度，敬而远之，并不以诚相见。因此这个教会，始终是孤立的。只是不冷不热，不死不活，平平淡淡地过了六、七个春天，在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后，随告结束。

(八) 三自革新运动

解放后，呼市所有教会，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护下，愉快地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信徒们从自己切身经历中，识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反宣传的真象，辨明了是非，认清了真理之所在。深感共产党的温暖可亲，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可爱，大家心情十分激动，一致表示要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振兴贡献力量。

一九五〇年中国基督教的吴耀宗先生为首的代表发表了“三自”宣言，我们呼市基督教人士积极响应。次年联合呼市各教派，成立了呼市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在筹备期间，遭

到了呼市基督徒聚会处头头们的疯狂反抗。他们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地敌视三自革新运动。在信徒中散布什么参加三自革新运动，就是与世为友，与神为敌。污蔑筹备“三自”的教牧人员，是拜巴兰的先知，是出卖耶稣的犹大，是淫妇耶洗别，是撒旦魔鬼。他们毫不顾及中华民族的威仪，跟随北京基督徒会堂头子王明道，费尽心机对“三自”进行破坏。甚至说什么：“宁可为耶稣流血牺牲，也不能与三自同流合污”。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因而引起了全市人民的公愤，并遭到了社会上的谴责。当时，我们采取了冷静态度，耐心等候争取他们的觉悟，回到三自革新光明的道路上来。但经过一年多时间，他们不但没有悔过之意，反而变本加厉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与三自道路为敌到底。我们不顾他们的倒行逆施，于一九五四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协助下成立了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

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成立，为呼市各教派合一美景开创了有利条件。各教派合一是一千年来中国的教牧人员所渴望并孜孜以求的心愿。过去各教派之间，各持己见，彼此指责，互相攻讦。爱国会成立后，各教派之间的成见，逐渐消失，皆能开诚相见，互谅互解，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呼市各教派合一的新局面，揭开了中国基督教史上新的一页。信徒无不赞美说：这才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真正地出现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中国教会共有七十多个派，要实现合一，谈何容易。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呼市教会终于合一了，这是内蒙基督教史上的奇迹。全市信徒心情振奋，非常高兴。而基督徒聚会处仍无动于衷，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结果受到应得的惩罚。聚会处的几个头头被人民政府逮捕了，聚会处的信徒在人民政府的耐心帮助

教育下醒悟了，回到了三自爱国道路上。我们欣喜地收纳了他们。从此呼市教会更加欣欣向荣，过上了正当的宗教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横行肆虐，呼市的教会遭到封闭，许多教牧人员被抄了家，有的教牧人员被判刑，信徒们也被迫停止了正当的宗教活动。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教会才又恢复了正当的宗教活动。党和政府为了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为基督教受害者平了反，补发了工资，恢复了工作，并为教徒积极准备聚会、礼拜活动的场所。首先恢复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工作，派代表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会议。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区基督教协会，把我们内蒙教会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使内蒙的基督教信徒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爱国爱教，宣扬基督纯正的福音，为四化贡献力量。

上述情况，说明了三自爱国运动强有力的生命力。如果没有三自爱国运动，我们中国教会就不能实现自治自养自传，也不能实现目前全市教会团结的新局面。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分子借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象一座大山压制着中国教会，不能独立自主、自养、自传。教会也成了他们的附属物。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并不是在教会传道，而是籍传道为名，实现其殖民主义统治的阴谋。这是违犯圣经真理，背叛神的旨意的。帝国主义分子正要把我们教会变成他们“贩卖牛羊鸽子的贼窝”。为什么社会上有的人对我们教会不理解，有气愤，就是由于一些披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玷污了神的教会，践踏了基督的纯正的福音。不实行革新行么？不革新教会就不能在西差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不革新就不能砸碎帝国主义加在中国教会上的锁链，使教会在中国自立；不革

新神的福音就不能纯洁。上述种种都表明革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样作，符合国家的利益，符合神的旨意，符合圣经原则。这样作的人胜利了，反对这样作的人失败了，不过失败者也接受教训醒悟过来，回到三自爱国的道路上来，就是我们中国教会史上可喜可贺的现象。我们爱国爱教的信徒，深刻地认识到三自革新运动，预示着教会兴旺的时期到来了，预示着纯正的福音门开了，预示着中国教会大解放，预示着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的宗旨实现了。但是现在还有个别人，对三自爱国运动不理解，有成见，甚至还持敌视态度。主要是我们的工作作的耐心，不深不透，须在今后进一步把这一工作深入地开展下去。

一切新生事物的出现，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要经过斗争，甚至是激烈的斗争。三自爱国运动的实现，就证明了这一点。开始时，抱拥护态度，坚持三自道路的是少数，出于敌意、坚决反对，并恶毒地进行攻击破坏的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随大流，如何扩大先进比例，减少后进人数，这是今后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我们要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决心把三自爱国运动进行到底，办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教会，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努力。

清朝和民国初年的 绥远地方部队及驻军概述

刘映元

一、满、蒙、汉军驻守绥远

绥远在清朝乾隆以前，地方部队只有蒙古各部的骑兵。乾隆二年修建绥远城，四年，满洲八旗由山西右卫移入驻防，从此有了满洲八旗兵。二十五年又从山西调来以汉族组成的绿营兵。满、蒙、汉军并驻绥远，保卫着这一片边防重地，并镇压各族人民对清廷统治的反抗。

满洲八旗于顺治皇帝未入关前就已建立起来，以红、黄、兰、白和镶边的红、黄、兰、白八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志，并进行区分。八旗有长白山满洲人编制的满洲八旗，也有最早归附清朝的科尔沁等部的蒙古人所编的蒙古八旗，还有明朝辽东镇投降清朝的汉族军民所编的汉族八旗。由于这些蒙古人、汉族人在关外同满族人相处日久，已跟满洲人融合一起，所以通称为满洲八旗和旗人。

乾隆四年从右卫移来绥远城驻防的满洲八旗中，有出征效力的在京（满洲）八旗开户兵二千四百名、热河驻防汉军一千名、右卫驻防的蒙古兵五百名，合共三千九百名（见《绥远通志》引《文献通考》记载）。

关于蒙古部队：在蒙古各部臣服清朝之后，均按满洲八旗的办法编制为旗。各旗的最高长官是世袭扎莎克。内蒙各旗扎莎克之上为盟长，外蒙的盟长仍保留汗的称号。唯独归化城的土默特部和察哈尔部不同，土默特部左右两翼最早各有一个平民出身的都统，和一个满洲人担任的副都统。察哈尔八旗和四个牧场都由平民出身的总管领导，总管之上才是满洲人担任的驻张家口都统。因为归化城土默特旗没有扎莎克，所以亦称之为土默特特别旗。乾隆四年建威将军由右卫移驻绥远城后，为便于直接掌握土默特旗蒙古部队，于二十八年撤销了蒙古世袭都统，并将两翼合并为一旗，由建威将军兼任都统，派一个满洲人任副都统，在归化城设立了都统衙门，管理土默特旗公务，土默特旗的官兵人数，据《土默特旗志》记载，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年明崇禎九年）为三千三百余丁；成书于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的《归绥识略》上说有“兵丁五千名，编为六十苏木（蒙旗的基层组织）”。“兵丁均无俸饷，种地为食，每兵一名种地一顷，官员以上递增”，“每年春秋二季，派拨一千名操演，为操演营，每名月给营银一两五钱”。“六十苏木各设佐领一员”，佐领也称章盖，是苏木的官长。负责管理本苏木的公务。土默特旗的佐领一半世袭，称作“勋旧佐领”，一半推选，称作“公中佐领”，由于“勋旧佐领”有的亡绝，无子承嗣，后来减为二十四员，“公中左领”增为三十六员。每五个佐领出一名兼任参领，负责领导这五个苏木的公务，地位和满洲八旗的协领一样，满语叫噶兰达，所谓“新旧两城有二十四家噶兰达”即指此。土旗的十二个参领，即噶兰达里边，有两个分别兼任左右翼长，掌管兵司和户司的印信，称为兵司关防和户司关防，为将军底下管理蒙旗的左右付手。以上是蒙旗的

大致情况，和土默特旗与众不同的特别地方。

关于汉军的设置。当满洲八旗兵在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入关时，只有二十多万人。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把明朝的边防军与野战军次第收抚，换上绿色军旗，故称为绿营。各级官佐基本上仍维持着明朝时的职称。《大清会典》上说“汉军皆用绿旗，是为绿营”。巡抚所属的绿营称为抚标，总兵所属的绿营称为镇标；后来满洲八旗官兵不断补入绿营，因而有些绿营，成了满汉混合部队。不过山西绿营的官兵仍然都是汉人。山西的绿营，除巡抚兼提督所属的抚标，还有太原和大同两个总兵所属的两部镇标（镇：相当于军区），这两部镇标就是以明朝的山西和大同两镇官兵改编而成。《绥远通志稿》军事卷记载，乾隆二十五年从山西调来的汉族绿营兵，是三个营。一个是以太原镇宁武协（相当于旅）属的利民堡营移驻归化城，称为“归化营”，一个是以大同镇的德胜路营移驻和林格尔城，称“靖远营”，一个是从大同拔兵移驻丰镇的高庙子，称“丰川营”。“归化”、“靖远”两营各设都司一人，营所驻归化城及和林格尔，共有马步兵五百零四名。丰川营设守备一人，营所驻高庙子，有马、步守兵一百零一名。归化营的营盘，在旧城小教场以南，现今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的营坊道街，就是因此而得名。《归绥通志》上说：归化营本部，除在浑津桥派兵驻守外，还在大、小什字、牛桥、大召前、南柴火市、东五十家街和小召前置有堆子房（巡逻兵休息处，相当于哨所）。

统率满、蒙、汉军的领导机构，是将军衙门。将军之下，设付都统二人。再下，设满洲协理八人，蒙古协领二人，汉军协领二人（协领、协理相当于蒙旗的参领，通称为噶兰达）。

驻绥远城的将军，权力很大，不仅能调动、指挥绥远城中的驻防军，还能调动、指挥乌、伊两盟十三旗和土默特旗的蒙旗，以及山西大同镇标、直辖宣化镇标和山西太原抚标所属雁门、宁武、偏关的绿营，为晋北和边墙口外的最高统帅，与河套西边的宁夏将军、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将军相互呼应支援，卫护这一广大的边疆地区的治安。

二、张之洞与贻谷练兵经过

清朝鼎盛时期，满、蒙、汉三军都很坚强。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农历五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指挥右卫的满洲八旗和大同总兵康调元、杀虎口副将王元、宁夏提督设化行所率的绿营，由鄂尔多斯部的蒙古兵配合，在外蒙昭莫多地方，取得战败噶尔丹汗的决定性胜利。可是从嘉庆（一七六九至一八二〇年）以后，由于升平已久，满、蒙、汉三军都日趋腐化，失掉了先前的战斗力。咸丰年间（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兴起，原先的满、蒙、汉三军已经不能打仗，故由曾国藩在湖南和李鸿章在安徽利用乡勇组织的“湘军”与“淮军”进行镇压。绥远地方部队中，土默特旗虽曾出兵随科尔沁旗亲王僧格林沁去“打南阵”，绥远城满洲八旗兵也曾开到安徽前线，但均系配合作战。至于归化、清远、丰川三部绿营，一直没有调去参加，而留在当地维持地方治安。同治七年甘肃回民起义军攻入陕北和河套，到达包头、托克托及**清水**河的黄河对岸，被刘松山、刘锦棠父子带的“湘军”、河南乡勇组成的安庆“毅军”与张曜“嵩岳军”击退。金顺所带的满洲八旗，也由东边开到绥西，后来进入新疆，但已不是主力部队。绥远城的满洲八旗，和大同总兵马陞指挥的绿营，仅能保守城镇未见开

出去野战。包头至河口镇中间的河防，还得依靠“淮军”派水师营和洋枪队前来担任。倒是打完“南阵”回来的土默特部队，因为经过战争锻炼，由乌尔图纳逊（八拜村的乌大人）率领，并指挥黑龙江开来的索伦族马队，在击退回民起义军的战争中，比较还能独挡一面。到了同治九年十一月，马化龙在金积堡投降被杀，战场移到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因为不敢依靠地方部队，好多客军仍在后套驻守，直至把最早开发的临河一带吃穷，才于同治十二年前后开走。

进入光绪初年，朝野都主张改革八旗和裁撤绿营，由于八旗牵涉过多，积重难返，故从裁撤绿营着手。归化营在乾隆二十五年初建时，在高大的营盘周墙里边，还建了一座关帝庙，每年定期唱戏酬神，呈现出一片兴盛气象。因为天下太平逐年裁兵，《绥远通志稿》据营册记载，说是乾隆四十七年归化营有兵三百六十六名，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至咸丰十一年（一八三一），共裁去八十五名，尚有二百八十一名，到光绪二十九年绿营完全裁撤时，归化营剩下马步守兵一百三十余名。于是所属堆子房，由五兵驻守变成一兵看管。原来的归化等营就相同于以后“巡警营”（警察局的前身）的性质，这时越发等于虚设。明朝九边的官兵，是携带家属在城堡中居住，满清收抚改为绿营以后，跟满洲八旗兵一样成了世职，穿上“号褂”是兵，脱下“号褂”就成了百姓。满洲八旗兵是坐享俸禄，汉族绿营兵则士农工商皆干。据说归化营未撤以前，不穿“号褂”的兵，已经把营坊围墙挖空，推上小车进城出售黄土。当时全国绿营多半如此。人数有一百多万，每年靡费饷银在一千万两以上，但无济于防务，根本不能打仗，故取消绿营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期间，革新派的重要主张之一。

清末，中国维新派政治家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于光绪十年整顿绿营。奏请朝廷选练士兵酌改营制，减兵加饷。就是由绿营中挑选精壮士兵，另组“练军”，进行训练，提高战斗力。时“湘军”已经遣散，军官多加入“练军”，故以后“练军”和“巡防队”中有不少湖南籍的军官。原议山西共成立四军，除巡抚的抚标和太原、大同两镇镇标之外，在归化城再建一军。经过兵部决议，仍维持三标，即在山西全省挑选马步“练军”十七营旗，大同镇共练马队七旗和步队一营，马队一旗官弁民夫为一百九十六员名，步队一营官弁兵夫为五百零五员名。“练军”的马旗编制小于步营，而马旗数目比步营为多，大同镇的练兵虽然是七旗一营，但习惯称为“八旗马队”所以大同镇的“八旗马队，很容易和满洲八旗与察哈尔八旗混淆。当时驻归绥道的练军，为马队三旗和步兵一营，系由山西大同调来的。归绥道是清廷为实行蒙汗分治政策，于乾隆六年（一七六八年）设置的。属山西省管辖，相当于现在的专区。下辖归化城、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五厅（厅后改为县），乾隆十五年，又设置了丰镇厅和宁远（凉城）厅，合为七厅。这三旗马队和一营步兵，计在萨拉齐厅之大余太驻马队第三旗，宁远厅之舍必崖驻马队第四旗、归化厅之察素齐驻马队第五旗，萨拉齐之包头镇驻步兵一营。共有马步兵一千零九十三名。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在山西口外不断发生义和团反洋教斗争，绥远城将军永德和归化城副都统文奎为了镇压地面，仿照绿营排练“练军”的办法，先在土默特旗旗丁中挑选精壮三百名编为巡防队，设营总一员，营队佐领三员。官员酌给津贴，每兵月饷三两。此为土默特旗有常备队的开始，后来的“老一

团”就是由此演变而成。二十七年十二月，绥远城的满洲八旗排练了三百名常备新军，设立武备学堂，招生六十名，兵弁学生均按马兵待遇。在同一时期，归化城还增设了山西的巡警营，满洲八旗及土默特亦各设了巡警兵百名。土旗的新军营盘在旧城南顺城街对面（现回民区医院），满洲八旗的新军营盘在新城西门南路（现新城区人民政府）。从此新旧两城街上，开始出现了手持警棍的警察。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清廷正式成立练兵处，以奕劻为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铁良为襄办，开始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各地绿营于这一年完全裁撤。山西巡抚张曾敫奏准在口外招练续备军马步八旗，添设统领（如同团长）一员，以总其事，仍由大同镇统辖。此时钦差垦务大臣贻谷，兼绥远城将军，在绥远成立垦务行辕卫队，把土旗巡防队改为常备军。为了装备其卫队及满蒙两营常备军，派人到天津向德商泰来和信义洋行，订购新式五响毛瑟、马步快枪一千一百六十枝，土默特常备队也购买了新式马步快枪二百四十枝，此外还购买了德国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新出的快枪四百枝。绥远城不久又成立起炮队，由北洋武备学堂炮科毕业的本城满族人嵩秀带领，所配备的十几门新式大炮，也是在此一期间购置的，贻谷为加强自己掌握的满、蒙、汉三支军队，于光绪三十二年把绥远城和土默特旗的常备队，一律改为陆军，都用新式武器装备和施行新式训练，并于这一年把口外马步八旗汉族续备军改为后路巡防队，共分五队。这就是老年人常说的“外八旗巡防队”。绥远城的陆军为第一营，土默特的陆军为第二营。营和巡防队的编制大致相同，于管带（相当于营长）之下分为三哨（相当于连）或四哨，只是巡防队仍穿绿营时代的“号褂”，

用蓝布包头，不戴军帽。使用着“斜五眼”和“正五眼”一类的称为“米复炮”的旧式步枪。在驻防军队改制的同时，绥远城的武备学堂改为陆军小学。在绥远城的学生之外，增添了土默特旗的蒙古学生，和山西右玉满洲八旗学生。

绥远城将军贻谷，亟力进行各项革新，亲自督练新旧两城新式陆军，深入兵棚和学生斋舍，跟士兵学生接近，激励忠君爱国思想。由于办理蒙垦受到满蒙官僚、蒙古王公和汉族地主的联合反对，光绪三十四年被参革职。巡防队统领谭涌发、管带胡泰才和垦务行轅卫队队官李得功，亦因参与缉捕准格尔旗协理冉丕尔获罪，送往张家口军台监禁。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巡防队一半随统领周维藩参加了闫锡山的山西义军，其余有的哗变为匪，有的跑到包头被五原厅同知樊恩庆利用王紫绶及谢若霖两哨人消灭打散。绥远城将军堃岫，为防守归、绥两城，除电请北京救援，派新军一部来绥，并扩充绥远城和土默特旗陆军，绥远城陆军扩为步队两营和马队、炮队各一营。管带为阿克敦、宁双安、李春秀、赵嵩秀；土默特旗陆军于原先的步队一营之外，另组了一营守备马队，管带为发义和福坦。还把谭涌发、胡泰才和李得功从张家口军台释放，招集旧部组织了新巡防队，由谭涌发担任统领，胡泰才和李得功担任管带。闫锡山的义军由包头东进时，第一镇的新军还未开到，堃岫就是利用绥远城的新军步炮队固守新城，调五原厅同知为归化厅同知，指挥包头退下的王紫绶和谢若霖两哨扩为两队的巡防队，和临时组织的回民清真民团维持旧城秩序，让谭涌发指挥新成立的巡防队，配合土默特陆军和守备队马步两营作为主要野战部队，在现今陶卜齐车站北的刀什尔村，将闫锡山的义军战败，沿黄河退往托城和河口，归绥转危为安，避免了流血革命和战争破坏。

三、第一次百灵庙战役前后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迫使参议院选其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了北洋政府。这时闫锡山已归附袁世凯，把队伍从托克托开回山西忻州，过完春节不久进入太原，就任了山西都督。绥远因无战事，把开来防御闫锡山的新军第一镇第一协（旅），调回北京一标（团），留下孟效曾为统领（团长）的一个混成标（步兵一营、骑兵一营、机关枪一连、卫生队半队），协助绥远城将军莒岫维持口外的秩序。从此结束了清朝的封建统治，而进入民国的军阀割据，大小军阀都招兵买马并兼地方部队，以扩充自己的武力。

改朝换代后的新体制，于民国元年下半年初具规模。公历六月八日，公布了表示汉、蒙、满、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兰白黑五色国旗。军队方面，把镇、协、标、营、哨改为师、旅、团、营、连。绥远城仍设有将军。行政方面归绥道原辖七厅，光绪二十九年又增设武川、兴和、五原、陶林、东胜等五厅，合为十二厅。此时改为十二县，知事都由山西都督兼省长闫锡山委派。归绥兵备道改称归绥观察使（后改道尹），依旧归山西省管辖。八月间北京政府任命直隶大城人张绍曾为绥远城将军，贾宾卿为土默特旗副都统，潘礼彦为归绥道观察使，莒岫、麟寿、咸麟等满族官员被撤换。新任绥远城将军张绍曾，原为驻防京东滦州的清朝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二十镇营级军官施从云、王金铭、冯玉祥、张之江、李鸣钟、韩复榘和郑金声等，受李大钊老师白雅雨（天津政法学校教师）鼓动，曾在辛亥革命期间举行过“滦州起义”，起义被袁世凯派王怀庆镇压平

息。因此，袁认为张绍曾倾向革命，对张有所怀疑而不敢重用。改制后虽让张仍任二十师师长，可是明升暗降，以兼任绥远城将军名义，使其脱离部队，只许带一个混成营作为卫队前来绥远就职。

在张绍曾未来绥远以前，外蒙受沙俄支持唆使，已于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公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翌日，即宣布脱离祖国独立。张来绥远以后，外蒙传檄内蒙各旗响应。张绍曾派其参谋长朱泮藻率领孟效曾团先后到四子王旗和杭锦后旗，把乌、伊两盟盟长请到归绥，并通告十三旗扎莎克前来出席“西盟会议”，在政治上争取封建王公赞助共和；同时整顿地方部队，把绥远八旗兵，土默特旗蒙古兵，大同镇巡防队五营，增练巡防队二营，垦务局巡防队一营，连同第一镇留下的混成团，合编为绥远混成第一旅和第二旅，任命朱泮藻兼晋北中路防守司令统一指挥这两旅部队，以应付库伦方面出兵南下。

两个混成旅都是一团步兵和一团骑兵。步兵团均由三营编成。第一旅附机关枪一连和炮兵一连，第二旅附陆炮、山炮各一连，组成炮兵营。第一旅旅长由第一混成团团团长孟效曾充任。步兵第一团由第一师混成团的步兵营、发义的土默特旗步兵营和王紫绶的巡防队组成。骑兵团是以第一混成团的骑兵营为基础，加入巡防队的骑兵组成。第二混成旅基本上是由绥远城满洲八旗的四个步骑炮营扩充而成，步兵二团团团长兼一营营长是宁双安，二营营长是棠景斌（后任热河汤玉麟的参谋长），骑兵二团团团长兼一营营长是李春秀，二营营长为土默特旗骑兵营长福坦，三营营长是原驻包头的巡防队管带谢若霖，炮兵营营长为赵嵩秀。除福坦、谢若霖和步兵三营营长杨素生而外，其余军官皆是绥远城满族人。至于第二混成旅长吴吉昌，则是从二十师

调来。骑兵游击团完全是贻谷办垦时的巡防队和垦务钦差行轅的卫队组成，故由谭涌发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其余两营营长为胡泰才和李得功。

绥远的两个混成旅和骑兵游击团，于民国元年十二月编组完成。民国二年二月山西边墙口外，成立了三个防备外蒙军队南下的司令部。东路司令由大同镇守使陈希夷兼任，指挥其担任大同总兵期间从直隶省带过来的十几营“毅军”，在丰镇隆盛庄至陶林县滂江（后划归锡盟西苏尼特旗）中间布防。西路司令由山西陆军第一师长孔庚兼任，指挥“晋军”的一个混成旅，在包头至后套乌兰脑包之间布防。中路司令由张绍曾的参谋长朱泮藻兼任，指挥绥远的地方部队在包头至丰镇间布防。外蒙于六月间派陶什陶和松彦光汗（海山）率领主力部队向归绥方面前进以前，三月间即有达拉特旗后套的“召官”白彦公（外蒙伪皇帝封给的公爵）和王爱召大喇嘛王登呢玛等，率众在包头以西袭击“晋军”。与此同时驻防武川伊克尔的绥远混成二旅骑兵二团二营连长玉禄，受土默特旗佐领龙图，麻花板申的蒙民锦福（锦秃子）和公主府的朋楚克等煽惑，带领全连官兵投往外蒙。丰镇隆盛庄人卢占魁所率的“独立队”，也从外蒙领到俄国武器，和察哈尔右翼的武德功（格尔计老五）的马贼、张北县张承德（野猫张）的土匪在绥东察北进行响应活动。此际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把正规部队大都开往南方，镇压国民党的“二次革命”，除张家口北面布置有少数中央陆军，西起阿拉善旗东至海拉尔，都由地方部队承担防务，故情势非常危急。

晋北总司令绥远城将军张绍曾，因东西两路都缺少骑兵，便将谭涌发的绥远骑兵游击团，拨归孔庚调遣，填补了包头至后

套之间的空隙；又将绥远混成第二旅骑兵团的谢若霖营，驻守锡盟西苏尼特旗的滂江，以充实东路防卫力量，中路由于兵力单薄，把军事重镇百灵庙放弃，将防线紧缩到大青山地区，据守了武川、陶林和乌兰花镇。绥远混成第二旅除警卫武川，并兼归绥城防，故把混成一旅步兵团的王紫绶营，由陶林调到武川，归混成二旅指挥以加强防务。

外蒙军队主力于六月间大举南下，因为持俄国快枪，并有俄国炮兵掩护，来势非常凶猛，集中兵力寻找边防部队进行决战。在东路谢若霖失守滂江，溃退到陶林北的四道沟，尾追上来的外蒙喇嘛骑兵，在此将混成一旅步兵团发义的第二营冲散，随营参事张之江，急将谢若霖军前正法，混成一旅旅长孟效曾拚死抵抗，才将陶林县城守住。西路方面孔庚的“晋军”腹背受敌，把狼山和乌拉山完全放弃，在崑独仑沟以东的大青山区设防，固守了包头的外围。所以，绥包两地宣布戒严，富商均装车准备逃跑。张绍曾发电告急，请袁世凯火速派兵前来救援。中路方面，左翼的混成二旅旅长吴吉昌，被困于武川西北的麻忽图，营长王紫绶阵亡，西路司令孔庚派出“晋军”的张培梅团进行侧击，此处始行解围。中路司令朱泽藻把宁双安的步兵团和赵嵩秀的炮兵营完全从归绥开出，摆到正面亲自指挥，在武川城北二十里处的前厂汗鹑鹑构筑了防守工事。后厂汗鹑鹑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以后，又在前厂汗鹑鹑布置了第二道防线，一直坚守。七月一日，二十师徐廷荣第八十混成团星夜由滦州开到武川，八日，由宁双安团组成左支队，徐廷荣团组成右支队，在赵嵩秀的炮兵营掩护下，主动向北出击，于十日下午四时，把百灵庙夺回。百灵庙收复后，晋北前线转守为攻，东路收复了滂江和西苏尼特旗，西路也收复了大余太和

后套的乌兰脑包。由绥远城满洲八旗兵编成的绥远混成第二旅步兵团与炮兵营，坚守厂汗鹞鹄并配合八十团攻克百灵庙，在此次战役中，起了决定胜利的重大作用。

外蒙军队在内蒙西部地区失败，东部地区也被米振标的“毅军”和吴俊升的“奉军”击退。所以沙俄气馁，同意在恰克图跟中国的外交官员谈判，于十一月间决议让哲布尊丹巴活佛取消博克多汗帝号，悬挂中国的五色国旗。

在这以前，张绍曾因混成二旅骑兵团福坦营的玉禄连长哗变，对土默特旗官兵发生怀疑，在部队开回归绥，便以更换新枪为名，把福坦骑兵团和第一混成旅步兵团发义营的武器收走，然后将徒手官兵召集到小教场宣布解散。民国三年二月张绍曾并把国家每年发给绥远城满洲八旗兵的二十五万余两饷银取消，由这年六月改发半饷，后来减为半饷之半，最后变成旗民救济费，到民国十年完全停发。张绍曾于民国三年四月间调回北京总统府，袁世凯另委前二十镇四十协统（旅长）山东济宁人潘榘楹为绥远城将军。五月晋北解严，第一师孟效曾团、二十师徐廷荣八十团和大同陈希夷的“毅军”完全东调，三个防守司令部撤销，谭涌发的绥远游击骑兵团，拨给“晋军”第一师，孔庚率领此部骑兵和“晋军”的一个步兵旅，离开包头到大同充任了晋北镇守使。这样原来的绥远两个混成旅，经过伤亡、解散与外调，人数减少，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

新编的绥远混成旅旅长的姓名来历待查，团长为郑金声、倪海门和王海如。郑金声在辛亥革命时任过清军二十镇的营长，曾驻防山海关，据判断，绥远新编混成旅是由二十镇这个系统的军官所掌握。他们把原来绥远城八旗与大同镇巡防队的军官大都裁撤，只留下赵嵩秀所率的炮兵。从民国三年七月

起，直隶和山西两省口外的边地，建立了相同于省的热、察、绥三个特别行政区。把山西口外绥东四县划给察哈尔区，绥远区为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五原、东胜八县和土默特旗与乌、伊两盟十三旗。潘榘楹改任绥远都统。这时投奔外蒙的马贼、土匪和变兵，因外蒙不予收留，都流窜在热、察、绥三区各自独立活动。热、察、两区为北京屏障，袁世凯利用清朝的“淮军”和“毅军”，在林西、多伦、丰镇等处，设立了好几个镇守使就地筹饷养兵，加强热、察两区的防守力量。所以，蒙汉两族的“独立队”，都集聚到绥远地区滋扰。潘榘楹以一个混成旅的兵力，不能护卫绥远全区，只好把后山放弃，后套让甘肃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派兵驻守。各部“独立队”最初以土默特旗玉禄的人马最强。张绍曾于民国二年秋天，把发义、福坦两营解散以后，好多官兵投奔玉禄。经归化城巨商“大盛魁”经理段履庄建议，由玉禄的族兄土旗士绅武尔功说服玉禄，于民国三年十一月，把玉禄的“独立队”收抚。潘榘楹给玉禄编了一营绥远游击队，段履庄把其余收容起来，交锡拉毛利召的银海喇嘛率领，给归化城商务会编组了保商团。

（四）镇压卢占魁与哥老会

民国四年五月，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策划恢复帝制，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很重视绥远的“独立队”，派弓富魁到武川同兴公找见卢占魁，劝导反对袁世凯。卢把各部独立队统一起来，由打家劫舍改为攻城略地。潘榘楹只有一个混成旅，以两团步兵防守归绥，派一团骑兵防守包头。卢部将包头包围，把绥远交通切断，潘急电北京求援。袁

世凯于民国四年十二月让冯占元率中央陆军第二师，带步骑炮共十营人前来镇压，在茂明安旗色带沟被卢占魁打垮，大炮完全丢失，退回包头关门拒战。卢占魁趁机由武当沟、水涧沟和黑牛沟等地，从后山进入前山。民国五年一月六日占领萨拉齐县城。当冯占元师到达包头后，绥远混成旅的郑金生团开回察素齐，卢部前有郑团死命抵抗，后有冯占元的副师长李际春挑选的精锐追击，故撤出萨拉齐，于十五日攻下托克托县城，过河以后，于二十八日进入东胜县城。过完春节，卢在陕北和陇东转了一圈，联合定边高士修和庆阳张九才的“哥老会”众，声势更为壮大，在开河以前进入后套。接着又从后套带队东进，把包头包围。三月间袁世凯任命驻多伦的察东镇守使肖汉杰为绥远剿匪会办，率领八百多“淮军”精骑前来协助李际春。虽然解了包头之围，并在武川厂汗鹑鹑给了卢部重创，但当肖汉杰部因察东有事开走之后，卢占魁仍把绥远的农村牧野大部控制，和蔡锷的云南护国军南北互相呼应，威胁着袁世凯的统治。

潘渠楹因各县告急，把绥远混成旅都开出去保守城池和重要商镇。除了让武川县长王朝烈兼警备司令，收抚跟卢占魁联合的汪伸臣、达赖公（哲布尊丹巴活佛所封的镇国公）、白彦山（土左旗榆树达尔甲人）等部热、察、绥三区蒙人，编为色楞巴和白彦山两个骑兵团。因归绥城防空虚，于五月间成立了三路警备队。第一路分司令在马福祥任都统时为王绍宸，第二路分司令待考，第三路分司令为土默特旗的玉禄。第一路有步兵两队，官兵共二百人。第二路步骑各一队，官兵人数与一路相同。均在新城驻防。第三路有骑兵四大连驻旧城。这样绥远除了一个混成旅，并设立了三路警备队，前者按正规陆军八成发饷，后者

按正规军发上成饷，地方的收入不够支发，北京财政部予以补助。

袁世凯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经御用的国民会议代表一千九百余人投票，拥戴为‘皇帝’，把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由于卢占魁在绥远袭扰，蔡锷在云南起兵，以及广西等省宣布独立，于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洪宪元年重改为民国五年。不久，袁委派前去镇压西南的四川督军陈宦，在成都也宣布起义。在众叛亲离的情势下，袁世凯于六月五日忧愤病逝。由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独立的各省宣布取消独立。从此北洋政府为安徽合肥人段祺瑞代表的“皖系”把持。绥远都统潘渠楹失去袁的靠山，段祺瑞派直隶天津人蒋雁行（后为吴佩孚参谋长）为绥远都统。蒋雁行于十月间抵绥，带来中央陆军第一师蔡成勋的褚恩荣旅驻于包头，由前清任过新军第十镇二十九混成协骑兵营长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王培焕，担任了绥远混成旅的旅长。这时冯占元第二师留下的李际春第四支队仍未开走，加上第一师的褚恩荣旅还是对付不了卢占魁，所以蒋雁行不得不在这年农历十一月间把卢占魁部收抚，编为绥远骑兵旅，委卢为旅长，“格尔计老五”和“喜神老四”分任团长，从包头北的合睿洋堂开到乌兰脑包驻扎，依附卢的一万人，都围绕在绥远骑兵旅驻地周围歇马，停止了到处抢掠，在后套立起“牛旗”广种了鸦片。

民国六年前半年，因总理段祺瑞欲参加欧战，与总统黎元洪意见不一，遂发生了府院之争。六月中旬，张勋以调停为名从安徽率领五千“辫子兵”进入北京，与康有为于七月一日拥戴清朝逊位皇帝溥仪复辟。绥远混成旅旅长王培焕，趁蒋雁行到北京参加督军团会议之机，杀了蒋所兼任警备司令属下的副

官长张凤朝，在归绥挂出了龙旗。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派飞机轰炸故宫，张勋于十二日逃入荷兰使馆，复辟很快就宣告失败。王培焕没有来得及和卢占魁联合便弃官逃跑。段祺瑞于九月间派蔡成勋率第一师的杨以来旅及沈广聚旅来绥，接替蒋雁行为绥远都统，部署解决卢占魁的部众。蔡把土默特旗玉禄的警备第三路以及武川西区民团编入李际春的支队，在混成旅之外另成立了绥远骑兵第一团。混成旅长待考，骑兵团长为靳永泰。卢部官兵在后套收割完鸦片，看见第一师全部集中绥远，便离开后套后山，由绥东转到绥南，从清水河渡过黄河，经陕北到达关中，参加了于右任领导的靖国军。蔡成勋怕卢占魁返回绥远，派李际春支队于农历腊月过河驻到榆林神木，加以防范，而将马德润与张春雨两营，于民国七年调回剿除零星散匪。玉禄的警备第三路和武川西区民团，到了民国九年农历六月初三，才从陕北返回绥远。

民国九年七月，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曹錕，联合张作霖的“奉军”，发动反对段祺瑞“皖系”的“直皖战争”。段祺瑞军战败。曹錕及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把蔡成勋调到北京担任陆军总长。由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代理绥远都统。民国十年前半年，蔡转往江西任督军时，把第一师和李际春支队的马张两营全部东调，还要将绥远混成旅带去，因地方绅士反对而作罢。蔡成勋离开绥远，“直系”的正规军再抽不出部队，遂让“西军”防守绥远，由马福祥担任绥远都统。马的“西军”共有三个混成旅，留下侄儿马鸿宾带一旅任宁夏镇守使，带来儿子马鸿逵和甘肃人蒋文焕（字辉若）的两旅，分驻于包头和归绥。此时卢占魁已随唐继尧派往陕西援助靖国军的军长叶荃南下四川，其所率部队沿途星散，隻身从昆明经越南到上海。因孙中山联合

张作霖“奉军”反对“直系”曹锟，卢占魁带随员何全孝等由大连抵奉天见张作霖，张委卢为骑兵旅长，命其回绥东活动，同时卢的旧部苏雨生和赵有禄率绥西土匪刘嘛喇、陈得胜、赵青山（赵半吊子）好几部股匪亦配合哥老会龙头杨万祯（小五杨）发起“海水大潮”，在后套、河西和土默川到处流窜，扰乱“直系”军伐在绥远的统治。

马福祥接任都统以后，蔡成勋的第一师还未开走，先是民国十年三月，驻莎拉齐的步兵傅营，和驻毕克齐的一个骑兵连哗变。冬天驻包头的沈广聚第二旅和驻归绥的杨以来旅不和，第一旅欲攻包头，第二旅作出守城准备。不是包头绅士刘澍等赴京呼吁，和马福祥从中调停，沈广聚旅和开到莎拉齐县援助第一旅的冯绍冈团几乎发生内讧。马福祥看到由外省人带领军队很不可靠，遂重用土默特旗人，把玉禄的三路警备队，改编为骑兵第一团，委玉禄为团长，“老一团”就是因此得名。

第一师全部开走之后，民国十一年三月，莎拉齐保卫团哗变，由团总侯斌成率领，开到和林公喇嘛，与进至凉城卓资山的卢占魁部，图谋会合后进攻归绥。因侯被马福祥调到归绥杀害，何全孝（第一中学毕业学生）带领攻入隆盛庄和兴和县城的“察西暴动”，亦被驻丰镇的察西镇守使乔健才的“老淮军”平息。卢占魁率领何全孝的残部由察北退到热河，翌年在黑山子地方被“奉军”热河都统阙朝玺，以点编发饷为辞，坠入包围罗网，被机枪集体屠杀，马福祥由于卢占魁的旧部尚在绥远及陕西，感到坐卧不安，除把哗变的莎县保卫团收编为营，由原来的队长石海带领，并让王英策动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高士修骑兵团马二营哗变。该营由张长城（外号干三）率领，当卢占魁随叶荃南下时，张率部由耀县玉金屯北返。这支队伍，尽

是河西和后套人，路过延安被高士修收留，开到三边驻防。张长城的护兵段佑菴（原名段得胜，后为杨虎臣陕北警备骑兵旅副旅长），是五原南牛棋王英地伙计的儿子，受王英鼓动把张长城打死，将队伍归了马福祥，拥戴王英为营长。《绥远通志稿》军政卷所记，绥远都统署于民国十年把玉禄的警备第三路改为骑兵团后，又增编了两营骑兵，就是指的石海和王英的两个营。民国十二年春天，马福祥让萨拉齐的绅士刘会文成立警备第三路，因刘会文曾任“靖国军”第六路司令部参谋主任，让他收抚卢占魁和侯斌成的人。

高士修的“马二营”被王英拉走以后，杨虎臣因“靖国军”在陕西关中解体，率部到榆林投奔井岳秀，并编杨部为步兵团，开到三边接防，冯钦哉驻于宁条梁。冯是晋南万泉人，为闫锡山的反对派，曾于民国二年发动孔庚驻包头的“晋军”第一师兵变，冯驻宁条梁后，另一个参予包头兵变的晋北崞县人张佩留（字汉卿），率领好多胡景翼和弓富魁“陕军”中的国民党晋绥籍地下工作人员，也进驻到宁条梁镇，把亢吉三等人派往苏雨生、赵有禄、刘喇嘛的“会匪”里边，由张作霖在包头的特务机关“鲁昌洋行”给接济子弹，所以“会匪”越发活跃，把包头包围，进入五原、托县，绑架了英国的游历武官和比利时传教神甫，打死托县知事徐焱和玉禄的连长多才。马福祥除让郑金声和马鸿逵成立绥东绥西两个司令部，会剿窦飞龙等哥老会众，并派都统署参谋长赵守钰，中校参谋陈玉甲，双骑到河西面见苏雨生等，商洽招抚事宜。经苏雨生、赵有禄、刘喇嘛等“会匪”首领同意，接受招抚，并把苏赵刘三部编为两营一连，成为受赵守钰直接指挥的都统署给发八成饷的官兵，绥远社会暂告平定。

民国十三年十月，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冯玉祥进行倒戈，在北京发动政变成功。民国十四年一月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冯的师长李鸣钟为绥远都统，绥远混战旅、老一团和刘会文、陈玉甲两路警备队，以及丰镇乔健才的察西镇守使所属部队，先后被“国民军”、“晋军”和“奉军”兼并或瓦解。经过情形相当错综复杂，我将另以专文介绍。以上所述是清朝和民国初年绥远地方部队及驻军的大概情况。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三辑

作者 =

页数 = 1 1 2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